

漫走解放區

陳學子昭

版 權 所 有

初版 1—10000 本

發行者 新 文 藝 社

著作者 陳 學 昭

經售處 東 北 書 店

各地中蘇友好協會

價 目 拾 元

中華民國卅五年五月十五月初版

前 言

我想其實不需要再加以說明了，這十五篇簡短的報導，是在我匆忙地走馬觀花，常常一天一個地方的行程中，給解放區劃下的粗糙的輪廓；但雖然是粗糙，却是真實的。

現在把這些簡短的報導集起來呈獻給關心解放區的讀者們，也許太唐突罷！在我，只是拋磚引玉，我希望因此而能引起在解放區久經戰鬥或參加建設解放區的人，來給解放區作具體、生動而完整的介紹。

陳 學 昭

一九四六年，四月。

漫走解放區

目錄

前言

告別延安——讓我永遠學習毛主席的思想	一
在陝甘寧邊區境內	五
進入新老解放區	一一
五寨一瞥	一七
過同蒲路	二二
生活的體驗	二七
張垣四日	三五
無人區和人圈	四〇
被摧殘的農村	四四

赴承德道中	五〇
承德小住	五四
宮原和本溪所見	五七
在一個鐵路員工的家裡	六二
人民的審判	六八
『這回我可樂了』	七四

告別延安——讓我永遠學習毛主席的思想

描寫我居住了七年的延安，覺得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也許人們和歷史家們能用千行的長詩，或者整部的書籍來寫述自從八路軍來到陝北以後，這個地方所發生的種種，而我呢，只能用我的笨拙的話來向它告別！

當一九三八年八月我到達延安的時候，這個古老的延安府（就是「水滸」傳裡面開卷第一回「王教頭私走延安府」的那個延安府），就其面積說來，遠遠及不上江浙的一個中等城市那樣大。從高山上望下來，整個城市是橢圓形的，西邊靠着一列的黃土山，東邊依着延河，從南到北直貫着一條大街。街道上和商店門口擁擠着人羣。商業是繁榮的，城市是完整的。紅軍（八路軍改編之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來到陝北是並不很久的，緊接着便是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形成了新形勢下的國內團結，發動了全國的抗日戰爭。——毛主席「論聯合政府」——但敵人害怕中國不打內戰，害怕國共兩黨的團結，就發動了盧溝橋事變，紅軍沒有得到休息，就奉命改編，開赴前線。在街上我們看不見撐鎗的人，他們都走了，上前方殺敵去了。可是

滿街滿巷却充塞着穿了各色各樣衣服的青年男女，他們是從四面八方，從南洋或從更遠的地方來的，他們來到這革命的聖地，在這裡學到怎樣抗戰，和抗戰建國的本領，又出發到前線去。毛主席說陝甘寧邊區是一個出發點和落腳點，是指革命的隊伍和革命的幹部在這地方整訓、學習和休息，又從這地方出發到別的地方去。這些革命的隊伍和幹部在全國各地，在保衛國土和解放人民的事業中，獻出了生命和血，有的會獻出他們的全部精力，他們的事業是大的。在延安，在陝甘寧邊區說來，它正完成着一個偉大的歷史的任務。

就在三八年的十月下旬，敵機連續轟炸，整個延安城是被毀壞了，但敵人只能毀掉房子和街道，它不可能毀掉軍民的精神。邊區政府幫助受災難的商家在離城的某處重新建立了繁榮的市場——後來稱爲新市場。不管怎樣大的災難，對於陝甘寧邊區的軍民，都是一個考驗和鍛鍊。

爲了持久抗戰，保衛家鄉，不讓敵人渡黃河，人民的武裝自衛軍早已組織起來了；爲了自力更生、突破封鎖、解決困難，在以農業爲主，工業爲副的生產建設運動裡：千萬畝的荒地變成了良田，勞動力也組織起來，各地都有變工隊和札工隊，甚至有不少整個村都是變了工的。農作法改進了，隨着棉花的種植，紡織手工業也開展了。無數的工廠建立起來，實用品——肥皂、火柴、玻璃、毛巾……以至部份藥品，都有邊區自己的製造品，在質量上也超過外來貨。人民有一年到二年的餘糧（耕一餘二，或耕一餘三），四季有新衣服穿，人民的政治覺悟大大提高了，人

人都自覺到不但已翻了身，而且真正是頂天立地的做了自己土地上的主人了！由於解決了土地問題，並澈底的實行了減租減息，人們的生產情緒是這麼高，某縣有一個瞎眼的老婆婆，請求別人領着她上山去挖地，傳為美談。在這期間，湧出了大批的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無數的吳滿有和趙占奎。人民的文化水準是提高了，從縣到村都成立了民辦公助小學，每個變工隊裡有識字小組，在農閑的冬季有冬學，正逐漸走向毛主席所號召的五年到十年之內消滅文盲。人民有自己的文化娛樂，每鄉每村都有秧歌隊或自樂班，他們歌唱和表現他們翻了身成了主人的歡樂。清潔、衛生教育的普及，醫療隊的下鄉，人民的死亡率是減少了，人口在增加着。這些事情發生在八路軍未到之前，一個文化十分落後，交通阻塞，被軍閥、土匪、和土皇帝，封建和迷信所長期統治着，人民吃不飽，穿不暖，孩子們沒有褲子穿，女人們露着胸，這樣的地方，並且一直是卡在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頑固軍的雙重封鎖裡，人們要以爲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蹟。

照我的認識，這一切事情和毛主席的思想是分不開的，我們可以從毛主席的著作：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論聯合政府……裡找到這個不可思議的奇蹟的解釋。而更不應當忘記的，是毛主席所號召的整風運動，思想改造。整頓不正的三風：學風，黨風和文風。整頓主觀主義的學風，因爲那種學習作風是死教條的，缺乏調查研究和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以想像代替事實，不合於客觀的情況，是脫離羣衆的；整頓宗派主義的黨風，

因爲那種宗派的工作作風往往局限於個人、少數或小部份的利益，是不附合於廣大羣衆所要求的；整頓洋八股和黨八股的文風，因爲洋八股和黨八股不是大多數中國人所能看得懂的，不是羣衆的語言，不爲羣衆所了解，也不爲羣衆所喜愛。毛主席要我們學習的一個中心思想：便是羣衆觀點，了解羣衆的需要，爲羣衆服務。在他的許多著作裡，在他每一次的講話裡，以及在整風文獻裡，他教導我們向羣衆學習，向人民學習，也就是教導我們要存羣衆觀點。

毛主席是這樣的了解祖國人民，這樣的熱愛祖國人民，懂得祖國人民的需要，他那合乎中國國情的，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了的活的、生動的馬列主義的思想方法和領導，從來都是正確的。今天，他和共產黨號召中國需要團結、和平和民主才能建設獨立、自由、富強而統一的新中國，這正是中國人民目前所迫切需要的，誰要是敢於發動內戰，誰就是人民的罪人，必然要受到全人民的唾棄！

別了，延安！別了，陝甘甯邊區，勇敢、辛勤樸素的人民！你所教給我的東西是這樣多，這樣珍貴，讓我永遠學習毛主席的思想方法，羣衆觀點，學習他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爲人民服務，爲工農兵、爲廣大的人民服務的精神。讓我們大家學習毛主席的思想，並把它貫徹到實踐中去，讓我們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把每個新的解放區都建設成我所告別了的延安和陝甘甯邊區一樣的自由、繁榮、幸福和快樂！

在陝甘寧邊區境內

由於從未經過行軍，——像這樣長的陸路旅行，並且用着這樣原始的交通工具：牲口，有時也還步行——一路我所聞的笑話，雖然沒有像唐吉訶德那樣人物所做的嚴重，但因為沒有作過調查研究，從主觀主義所產生的可笑的事，是並不少的。

出發的第二天，發現我那頭曾被大家稱讚的牲口，原是前兩天買來的，是一頭老百姓推磨的牲口，他不會跟着直線走路，只會轉圈子，在行人道上，好像一個醉鬼似的，牠的步子總是踏踏踉踉，顛來歪去的。在到五寨之前，我是一直把馱鞍騎鞍騎的，我很驚奇有些人能够在牲口上騎一整天，至於我，兩隻腳攔在騾子頭上的皮條裡，騎上半小時，腳就痛得不大好忍受了！在最初的幾天，騎上牲口，想下來走走；走上一些路，又想騎牲口。總之，騎也不好，走也不好。幾天後，膽子大起來了，也漸漸地熟悉了自己的牲口，牠的缺點；也會想辦法去對付牠的缺點，而在現有條件之下來較好地處理每天的行路。

開始，我們一天只走三十里，就宿營了；後來，我們每天從走四十里，五十里，直走到八

十、九十，甚至一百里的。在陝甘寧邊區境內，我們走得十分自由，並不像一般趕路的人的原則：「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我們出發有時已日高三丈，停宿的時候往往已在黃昏了。在陝甘寧邊區，社會秩序和治安是這樣的好，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這也是現實社會的情形，而不再是古書上寫着的人們的夢想。在出發的第三天夜裡，我們停在禹居，是一個鎮，店舖都已住滿了客人，我們好容易在一家驢馬大店歇下來，但找不到够足的窑洞，我睡在馬房邊的馬乾堆裡，闔上一塊門板，算是牀舖，雖然沒有門，也沒有窗，但却是安心睡到大天亮。

就在禹居，幾個老百姓聽說我們是從延安來的，走來問我們可知道毛主席去重慶談判的結果怎樣，可會回來。我說我們走時毛主席還沒有回來。其中一個老者說：「怎麼去了那樣久還不回來。」老百姓對於毛主席是這樣的關心和擁護，因為他是真正的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而和人民的利益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每天到一個新的地方，每天也有新的見識和接觸。「入鄉問俗」，我們可惜沒有很多時間去訪問，但所見到的，所聽到的，雖然只那麼一點點，隨處學習，也使我對於祖國，對於翻了身的人民，有更親切的了解。顯然的，我覺得陝甘寧邊區人民的生活，是大大地改善了，他們吃着麵條，油炸糕……穿着自紡自織的土布，小孩們都是胖胖的紅潤的面孔，活潑快樂的在田野間山坡上攔着牛或吹着羊。我便想起在勞動英雄大會上，毛主席談到這幾年的生產運動時，曾說到

生產建設，使邊區面目爲之一新。這新的面目，我不單在毛主席的講話裡聽到，在解放日報各地的通訊報導裡讀到，今天是親眼看到了。這是共產黨的領導、民主的政權、革命的队伍和人民這幾年來所共同努力的成績！只是在極端分散的農村中，由於過去文化長期落後，醫生的缺乏，雖然多年來經過反迷信和反巫神的教育，巫神在農村中是還沒有完全絕迹的，這還待邊區醫療隊今後繼續努力地工作，替老百姓治病，同時進行衛生教育。

從延川到綏德，是一個紡織區域。延川城外滿川都種着棉花，棉梗高高的，棉桃很大，可以看出會經過很好的打卡。延川是個模範植棉區會得過邊區政府的獎勵。特等模範抗屬折碧蓮住在附近的山上，可惜不是我順路經過的。

清澗，多麼美秀的地名！一條水流從青色的石板上流去，也許就是這地名的來源罷？在清澗我們做了縣政府一位女副科長的上賓，她是我同行的一位女伴的朋友。晚間，我們在縣府的石窰頂上，看清澗商界同人組織的業餘劇團演戲——戲台就在斜對面——這是他們自動發起演出，來慰勞留在這裡養傷的戰士的。演的是秦腔，箱子很新。劇的內容是一個風俗人情劇，所謂家庭悲劇：圍繞着一個不賢的後母虐待前母所生的兒子的種種情節。這類型的劇本是古典的，也是現代的，但從來就是中國式的，因爲那是半封建社會的特有產物。我們從南中國到北中國，到處都看得到的。但在共產黨領導的，實現了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地區，這個從古以來，連清官也覺得

頭痛的清官難斷家務事」的家庭悲劇，在今天已不復存在了。恰恰和外間某些傳說相反：共產黨很重視家庭生活，他們反對封建，他們主張家庭的結合應當是自願的，家庭的糾紛以調解融洽為原則；人們的家庭生活，正如社會生活一樣，是有民主權利的。從人權，從民主權利，從人情來處裡家庭糾紛，是最入情入理的，因此很多過去不和諧的家庭，轉變成為進步的。一家都積極生產，而生活得很融洽的模範家庭，這樣的例子，解放日報上曾有過不少的報導。我認為這也是共產黨的一個很好的創造。我們不能否認，在那種家長專制制度的家庭裡，人是被摧殘的。但像資本主義國家的小家庭，年老的父母往往和兒女是分居的，老年人的暮年是很寂寞的。今天在解放區的這種民主的模範家庭，可說是照顧了老的也照顧了年輕的；照顧了男的，也照顧了女的，是適合於中國國情的。

綏德位於盆地，商業繁盛，在過去文化也比較發達，號稱陝北的上海。附近有不少的古蹟：扶蘇是被賜死在這裡的，無定河邊的山上有他的墓。這裡又是韓世忠的故鄉，有紀念他的廟宇和石碑。我們在綏德休息了三天。

從綏德以後，我們開始借宿在老百姓的家裡。婆姨們以極大的好奇和熱情來招待我這個女客。「你來了麼？好像等候很久，如獲至寶似的。」「你幾歲了？有漢麼？她們團團圍住，便這樣問起來。真的你沒有漢麼？爲什麼不找一個呢？」「不好找。」「噢！你怎麼會不好找呢？」那

麼照你看起來，是很好找的了，說說看，你是怎樣找到的？」她們聽我這麼說，便格格地笑起來，拉着我的手，「好同志呢，你真會說笑話。陝北的婦女是開通的，爽朗的，特別是這些樸素的農民，不論男女，都有快樂的精神，並且差不多個個都是善於開玩笑的。接着她們便關心地問起來：『今天你走了幾里？熬了麼？』不必請求她們，就替你燒起洗腳水來。他們說：『你們都是歡喜清潔的，歡喜天天洗腳。』」

最令我不能忘記的是已經是夜晚九點鐘的光景，在月光下，迷了路，雖然划着火柴，在碎石子路上，找不到牲口的蹄印，我們請求一個趕路去替隣家死了人買壽衣的老鄉，給我們領路。螞蚱，這個鎮子真的像藏在螞蚱裡一樣的難走和難找。那天因路不好，我沒有騎多久的牲口，足足走了六十多里。我借宿在一家依山傍水的老百姓家裡，一位年近六十的老婆婆把我接到她那小小的石窰裡，她那兩關切簡直好像迎接她久別的女兒，她殷勤地把炕掃刷又掃刷，用一塊小小的布把紙窗上的一塊玻璃蒙住了——因為怕睡熟炕，我盡量往炕外邊靠窗的地方睡——「你熬了罷？脫衣睡覺罷！不要動輒了！」差不多帶着命令的口吻，她的好心和關切使我帳地起了微微的鄉思。睡在炕上，我聽她興奮地和我談他們的生活，八路軍來了以後，租息都減了，也沒有了苛捐雜稅，船夫——她的兒子是黃河裡的船夫——的生活有了保障，老頭子做一點小買賣，媳婦和她紡線，她滿意地說：「過日子還沒有什麼愁。在小小的麻油燈下，她一邊談，一邊熟練地剝她自

已紡的線，盤着兩腿坐在炕角。她的媳婦回河東娘家去了，孫子已經熟睡，她還起勁地倒着線。真的，他們對於生乖是這樣的積極，生活是這樣的愉快，充滿了希望！

這是我在陝甘甯邊區的最後一晚，想到就要離開這個地方，很少會有重來的機會，我有些感動。窗外，黃河的水滔滔地流着，流着，流着，不斷的流着，自由自在的流着，好像爲着解放了的祖國和人民而在歡唱着。濤聲引起我很多綜錯複雜的回憶，好像一會兒把我送到錢塘江邊，一會兒送到地中海。我也很自然地聯想到木蘭辭：『不聞機杼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顯然，時代是不同的，中國進步的女性在抗戰中所做的工作，所起的作用，在歷史家的筆下，將來也會有生動的一頁罷。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廿四日——

進入新老解放區

從張翊崙望到對岸，山西的山和陝西的山，同樣都是黃土質，沒有什麼不同，只是人們的說話語調，和風俗以及服裝是不同的。黃河把兩岸的山自然地劃分了界，這一段河身，看起來還沒有及得上長江的遼闊，只以幾丈的距離。我們從蠡鎮的碼頭上船，順流而下卅里，渡到磧口，費的一小時又廿分。我會好幾次聽人談到渡黃河是一件討厭的事：黃河好像是一個無情的老於世故的人，當他一翻起臉來，就可以立刻不理睬你。據說渡河的人都得在精神上有受得起驚風駭濤的準備。但如果水不漲，天氣好，沒有風，那麼也不是如何可怕的。當渡過一個駭浪的時候，船夫們便緊張的搖着槳，齊聲喊着，浪花飛進船艙，人們靜悄悄的危坐着，小孩子嚇得哭叫起來，也有人暈船而嘔吐的。但是生長在海邊的人，海的兒女，他們經歷過更大的浪濤，不會覺得驚奇的。

一踏進山西境，新鮮地投入眼底的是在斷牆殘壁上的許多標語：「武力和勞力結合起來」，「一面戰鬥，一面生產」：使人一下感覺到踏進了前方。

磧口、三交都是新近解放的。磧口會經過敵人幾次的佔領，也被敵人不止一次地轟炸過。街

道狹隘——舊時的石板路，但很長，兩旁擁擠着擺攤的人，他們都來自附近鄉間，想起來，一定是因為戰爭的關係，他們已習慣地住在鄉下了；街上的房子十室九空，好多被毀壞了，門、窗、板、壁，很少有完整的。居民還沒有恢復到正常的生活。

當我們走向三交，遠遠的瞥見臨河的城門口有一個烈士塔。三交曾經敵人二年多的佔領，爲着三交的解放，^註有七個優秀的共產黨員率領着二百多忠勇的民兵，作了壯烈的犧牲。三交的人民是值得驕傲的！三交，這地方也還有紀念的事故：當抗戰的前夜，陝甘寧邊區創始人之一劉志丹將軍率領八路軍抗日先遣隊東渡黃河，正進到三交，一顆可恨的反動派親日份子的子彈，打中了他！還在延安的時候，我會不止一次地在晚會裡，在老百姓的口裡聽到「歌唱劉志丹」的歌聲。陝甘寧邊區人民對於「老劉」（老百姓是這樣稱呼他的）是這樣的敬愛，當一聽到要修造志丹陵時，遠近的老百姓，不避炎熱，送這送那，甚至有抬着石頭來的。據說劉本富家子，曾是黃浦軍校的學生，國共分家之後，他回家鄉來，把家裡財富都散了，後來，成爲陝甘寧邊區的創始人。他能够走出自己生活的圈子，浸到人民中間，忠心耿耿地做人民的僕人，無怪人民這樣愛戴他。

三交雖然受敵人二年多的摧殘，可是一直都在八路軍的影響之下，人民是這樣的熱情，他們對於革命的軍隊，真如自己兄弟、姊妹樣的親熱。他們一定是從實際經驗中懂得，如果沒有八路軍，就沒有他們。無論問路也好，或向小攤攤上買一點東西也好，老百姓總是熱情地歡喜和你攀

談，談敵人的殘酷，和他們自己英勇戰的鬪故事。

在從三交到城莊的路上，我們向一個老百姓問路，他和我們談，當一九四〇年這地方第一次被敵人佔領時，老百姓所受的災難。敵人將該村四十多個婦女趕到附近的山溝裡，都被污辱了。死在敵人刺刀下的男女老幼，難以計算。那時，敵人大膽極了，二，三個人也敢上山去搜山，鎗上裝着刺刀，嘩啦嘩啦的，看見荊棘和草堆都用刺刀來挑。但是老百姓受了這一次慘痛的教訓後，他就更加相信八路軍的話了，再也不讓敵人如入無人之境的來橫行了。有骨氣的男人都參加了民兵，民兵普遍地發展起來，到處都埋有地雷。每個民兵，甚至婦女，都學會了埋地雷。一九四三年敵人再來時，中了八個地雷，一切東西都已堅壁起來，敵人不敢久留，也不敢搜山，就退走了。

當我們愈進入山西，敵人殘殺我們同胞的痕迹愈深刻地映入我們眼底。從城莊前去，我們過一處名康寧鎮，原先，我們準備在那地方過夜的；可是這地方簡直找不到一間較完整的房間，整個村子都毀了，甚至沒有一塊完整的牆，敵人在這一帶，所有殘酷的手段都施用過：『鐵壁合圍』、『梳篦隊形』，三光——搶光，燒光，殺光，——政策，想拿殘酷的手段，來征服、來統治我們敢於反抗的同胞。他們每次都是失敗了，碰了釘子回去。我們停在離康寧鎮八、九里之遙的另一個小村，這村莊的破壞僅稍次於康寧。我們一進這村子碰到的第一個困難，便是飲水問題。現

有的卅戶人家，只有三付水桶，每天他們都排定了次序輪流擔水。從前，家家都有一付水桶的，這許多水桶給敵人毀掉了，或是當柴燒了。這裡不出產木料，還得向外邊去想法，但是果如，眼前擺着水桶，他們也沒有力量來購置，因之，他們的希望是寄託在民主的政權——公家，相信公家不久會想辦法來幫助他們解決水桶問題的。

我們借宿的一戶人家，僅有一個中年男人，帶着他的九歲男孩，孩子的母親在某次敵人秋季「掃蕩」時，凍死在田溝裡了。他們像談說一件平常的事情那樣對我說着，我的心却忍不住緊緊的收縮着，我的眼睛也潤濕了。那孩子披着一塊破麻袋布，悚悚的發抖。男人對我說：「什麼都給鬼子搶壞啦！搶走啦！」但他們充滿了信心和希望，他們覺得只要有共產黨賢明的領導，加上軍民一致的努力，好好的生產，那麼在一，二年之內，他們就能做到有吃有穿的。他們很知道河西那邊的事情，更加有這樣的自信力。但他們受够了過多的教訓，他們決不容忍誰來專制獨裁，統治他們，支配他們，奴役他們，像敵人一樣的。我不能不同意，覺得他們的想法是對的，也相信他們如果被誰一頭上來時，他們會使用那豐富的戰鬥經驗，起來反抗的。

當這個男人和我談着，在我的身旁漸漸地圍攏了一大羣婦女和娃娃，看！好衣裳！她們是來看我的好衣裳的，其中一個摟着我的衣角，說：「又軟又暖。」我身上穿着一條西裝褲，和一件爲了不要大洋氣而故意改得土裡土氣的西裝上衣，都是七，八年前的舊東西，而在她們看來，是

這樣的珍貴、新奇。我從來沒有感到過這樣慚愧和苦痛，也從來沒有像這一晚而責備自己和不滿意自己的我。享受得太多，拿出得太少。忽然聯想起米克爾微支的「你往何處去」，不管它是帶着怎樣濃厚的宗教氣息，轉回羅馬去的信徒的自我犧牲精神，爲羣而犧牲自己，永遠是感動人的。一個革命者應有極高度的自我犧牲精神，具體點說，那就是個人的利益，服從於集體的利益。推廣廣之，他們可以爲集體，在必要的時候，甚至拋擲他們的生命。他們有自覺的紀律——由於有堅強的信仰，對人類社會有熱烈的愛和理想。劉少奇先生在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裡說得很透澈。我覺得這篇文章，對於我們一個普通的中國人，也是值得一讀的；對於做人的道理，有極正確的見解。

如果我在這地方留下兩年！我便能够親眼看到康賓鎮同胞生活的改善，我將和他們同過艱難困苦的日子，充滿着和他們一樣的希望。然而我畢竟走了，但他們留在我心裡的印象是深刻的：不管我將走得如何遠，當我一閉上眼睛，一個披着、塊破麻袋布的小孩，慄慄地发抖的影子，便映到我眼前來了。

過了一天，我又從新解放區走入老根據地：興縣。它是晉綏邊區的首腦地。這一帶地方，都是八路軍和人民從敵人手裡，經過無數次殘酷的戰鬥，奪過來的，最初是一小塊，一小塊，插在敵人的中間，現在，聯接起來了，整個晉綏邊區的面積在三十三萬一千平方華里以上，人口約三百

二十二萬餘。每年秋收時，敵人一定要來『掃蕩』，來搶糧，——『掃蕩』不止一次——去年，敵人也還來過。當敵人在崑崙札下據點，他總想來打擊這首腦地點興縣。四〇年以後，由於民兵的普遍發展，敵人來得少些，來既得不到什麼，常常被民兵伏擊，而且到處地雷，來也不敢久留。

興縣城東關毀得最利害。大街上一排排整齊的房子都是新造的。老百姓對敵人的仇恨深極了，因之對敵鬪爭的創造性也發揮得特別豐富和靈巧。興縣附近，到處都有英勇戰鬥的故事，道路旁還留着埋地雷的洞，也有破過路的痕迹。從興縣到界河口的路上，沿公路兩旁，有一個一個小土墩，上面插着一根木桿，約二丈深的壕溝圍着土墩，我覺得這些奇怪的墳墓很是刺目。問老百姓，才知道敵人爲阻擋民兵割電線，每個電線桿用土高高的埋着，四周挑了深溝，而變成這樣的。

原以爲東渡黃河無故人，却沒有想到在興縣就遇到了不少的新老朋友。在興縣附近的一個村上，遇見該區共產黨負責人張邦英先生，四二年某次當過路的幾個法國記者邀我陪去見高崗將軍時，曾見到過他，留給我的印象是樸素，爽直、乾脆，而有些天真的人。我們順路到他的地方去打采。蒙他贈送了我一頭好牲口。這幾年在延安和共產黨員相處的機會多些，覺得他們有個特點，他們自己的生活一切都極刻苦，但對於黨外人士總要設法照顧。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廿八日——

五 寨 一 瞥

當快走完築在山嶺上的一條平坦汽車路時，望見被稀稀落落的樹林所圍着的五個村莊，五寨，這該就是地名之由來了。我們入五寨城內，古舊的磚牲城堞，好幾處給礮彈毀了，子彈的痕迹，也一個一個的像蜂窩似的留在着。五寨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底淪陷的，今年四月二十五日，敵人被趕走，得到澈底的解放。在解放五寨城時，八路軍的一個團長曾身先士卒而作了犧牲。

我在城裡一家老百姓家借宿，四合院子正房的右間，是比較乾淨的房子，但是經過不乾淨的人住過的。門外有歪歪斜斜的粉筆字『日本人住』，後來，我走到街上，看見像樣些的房子，都寫有『日本人住』。紅漆的房門，綠色的油漆牆，小裡小氣的四方形木格窗子，嵌着一塊長方形的玻璃。從那刺目的不諧和的色調，輕織的木料，顯然，這些裝置都帶着日本的氣味。我們借西廂房一個木匠家的鍋灶燒飯，我便和木匠談起天來；在敵人佔領五寨之後，他就跑往鄉間去了，是在四一年，維持會把他找回來替敵人做活，以後，在整個敵人佔領時間裡，就再也沒有法子離開五寨城了。

這個深深地被污辱和被損害的城鎮，從其市容看來，是還完整的，但不可能想像在土地裡和在人民的心上，漫長的歲月中所留下的血迹和烙印。五寨曾是敵人的『模範縣』，所以是『模範』，是因為敵人在這地方統治得那樣嚴密和殘酷，殺人也是最多的緣故。南門外的一片叢林裡，不知埋葬着多少不屈的英魂；只要稍稍不顧敵入眼的同胞，都被敵入拖到那地方去殺戮了。敵人在五寨，常川駐有四個連，再加上偽警、偽軍、和平軍等等，老百姓是受刺刀和鎗彈的空隙裡喘息着。這樣還嫌不夠，敵入又想盡辦法來毒化和麻痺中國人民，在五寨，他們設了一個大規模的賭場、大烟館和妓院，三者合在一起，美其名曰『俱樂部』。再沒有比日本侵略者更殘酷狡猾而卑污的。敵入通過偽政權，偽組織來壓榨老百姓，因此竟有些老百姓恨偽政人員比恨敵入更甚，加上敵入在據點有時殘殺之後，施以懷柔政策和奴化教育，太直覺的老百姓，就像這個木匠，他對我說：『日本人在這裡也沒有什麼，他長住在這城裡，也不殺也不燒。』他僅僅因為自己的家人沒有被殺，自己的房子沒有被燒過，住在這盒子似的屋子裡，既不用眼睛，也不用耳朵，更不用腦子，只憑着一己的利益，以偷生苟活的觀點來說話。不難想像，在解放以後的五寨，所留給革命軍隊和革命政工人員的工作是如何的艱巨和複雜。我會遇到五寨十八集團軍辦事處的主任傅子和先生，他和我談剛解放後的五寨：敵入走後所留下的是二流子多，破鞋多。還在延安的時候，我曾從前方回來的同志口中聽說晉西北有破鞋，破鞋之多成爲風俗。所謂破鞋，是指出賣肉體，

既不是娼妓，也有別於私娼的這樣一種女人。在河曲保德一帶，曾流行着這樣的民謠：「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子走口外，女子賣風流」。晉西北兩性生活的混亂，並，是說晉西北婦女在社會地位上，或在兩性關係上，或在婚姻問題的處理上，和在封建社會時候有了改變。並不是的，封建勢力會那麼強大，女人在家庭裡，被翁姑丈夫隨意鞭打着，也被當做品物一樣的從這家又被賣到那家。童養媳也很普遍。性生活的混亂，只是證明了在這個地方存在着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一個經濟問題，正如上面的民謠，恰是很好的說明。在敵人佔領以前，這是被軍閥土皇帝所統治着的地方，當年成不好的時候，女人只好依靠出賣肉體來謀生。我們不能單從道德的空洞觀點，廉恥和貞操這一類名詞去菲薄破鞋，我們應當同情她們。自從五寨解放，有了革命政權，大規模的生產運動，二流子和破鞋是在逐漸走向消滅的過程中。今天，我所看見的五寨，是蓬蓬勃勃的，商店門口擁擠着人們，做小買賣的攤頭滿街都是。在小攤上我看到山西的特產葡萄和牛奶葡萄，索價邊幣百圓一斤。這東西引起我悠遠的回憶，想起一九二五年曾到過山西的。我常常想，當從一個無知的女孩，走了許多彎曲的道路，在今天，接近中年的日子，懂得的事情還是那麼少，還是那麼無知，然而我不喪氣，學習！學習！再學習！我願這樣自勉着。

在五寨停留四天，我作了一些訪問。五寨四週的村莊，正熱烈地進行着清算和反貪污運動——老百姓向那些在敵人統治時幫同敵人殘殺自己同胞，侵佔同胞財產的偽團長，偽村長算賬，可惜

時間不容許我去參加他們的大會。更遺憾的，在我到達晉綏邊區民兵特等英雄路玉小、和谷鏗的家裡時，他們正在幾分鐘之前出發上山替他們的隊伍打柴去了。省立二中是晉西北三個中學裡的一個，規模還大，現有學生二百多，青年同學們用着好奇而熱烈的目光注視我，他們一直送我到隔壁的服務劇團；在那裡，我正趕上看他們排演「王德鎮滅租」後來，帶回他們自己創作的兩個秧歌劇：「新村風雲」和「破鏡重圓」。前者是以路玉小爲中心，環繞着許多真實而生動的：發展民兵、各村聯防、創造武器、襲擊漢奸狗腿子、勞力和武力結合等等的故事。路今年二十六歲，曾是一個農民好獵手，當他參加民兵後，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不簽名的信：「既然民兵愛護老百姓，爲什麼像張旺賢這樣一個漢奸壞蛋還不除掉呢？」路就寫信給張，叫他再不能如此虐待同胞，張以爲這是一個「土八路」（民兵），置之不理，作惡如故。有一次，張從五寨到義津開會，路化裝一個女人在田畝裡割莊稼，因而惹得張旺賢的注意，以爲真是一個女人而去調戲她，被路捉住了。老百姓傳說路玉小「打仗像虎狼，在家像姑娘」，路在這一帶極活躍，老百姓敬愛他，敵僞害怕他。「破鏡重圓」是寫晉綏邊區特等勞動英雄鄧二在如改造二流子——有不良嗜好，出賣妻子，最後改邪歸正重圓的故事。服務劇團像八路軍裡其他的部隊劇團一樣，是替前線的軍民服務的，常常民兵給他們放哨，他們在離敵人二、三里的地方演出。

恰在我到五寨的次日，一個復仇的故事正轟動着全城，人們像神話似的傳說着。三義村附近的

郭林，原是一個殷實而厚道的人，某次偽政人員去徵糧時，狗腿子誣郭林私通八路，敲詐了一大筆錢財以後，把郭林抓去，用煤油罐上，燒得半死時，拖出去鎗斃了。犧牲者的胞弟郭開把哥哥的骨頭埋在五寨的城外。有一次，郭開在太原附近遇見了這個狗腿子，他悄悄地跟蹤了幾天，終究得到一個民兵的幫助，把狗腿子抓住了，但當民兵去小便的時候，由於疏忽，狗腿子竟得逃脫了。這一次，郭開來挖胞兄的屍骨，要把它運回家鄉去安葬，帶着香燭，正出城來，向路邊一個戴游草帽的伴似莊稼漢的男子，問訊可曾看見所約好的一個同伴，這個假裝的莊稼漢，正是殺害郭林的狗腿子，在敵人被趕走之後，他還潛伏在五寨一帶，替反共頑固軍做破壞工作。郭開也顧不得找同伴了，將仇人一把抓住，兩人扭打在地上，正難分解時，縣政府的一個工作人員經過，幫助郭開把敵人捉住了。老百姓把這個巧遇，竟帶着迷信，當做「烏盆記」似的談說着。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

過同蒲路

我們在某村停留三天，準備過同蒲鐵路；在抗戰時期，一般人過這條鐵路叫做「過封鎖線」；因為沿整個鐵路敵人滿佈了據點，五里路一個碉堡，配備着人員和重武器。敵人雖然已經投降，由於國民黨不准許八路軍接受日軍的投降，更由於閻錫山勾結敵人，把日軍用做反共的骨幹；同蒲路的敵人據點裡，不但依舊佈滿着敵軍，有幾處還比敵人投降以前加多了，他們四出擾亂，搶劫老百姓的財物。

我們到達那村莊時，正是「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裡」，老百姓這裡到處在打場，我不是畫家，却也被這幅辛勤、生動的景色所感動，使我聯想起米蘭的油畫「秋收」。

這一帶的物產不豐富，——包括五寨在內，只出產蕎麥、胡麻和山葯蛋。吃蕎麵，睡熱炕，這就是晉西北老百姓生活的概括。我第一次看見，蕎麥和蕎麵，也不知道這東西應該如何吃法，只好請老百姓幫我們做。我住的那家老百姓，妯娌倆很高興的幫我們做，一邊做蕎麵一邊和我談着天，她們把我從沒有見過過蕎麥這件事當做一個笑話，因而問這問那，想像我是什麼都沒有見

過，而是過着一種異樣的生活。她們把菘麵揉好之後，做成小小的一個一個捲，放在蒸籠裏蒸熟，這就可以吃了，她們告訴我，菘麵是耐飢的，照本地的習慣，吃菘麵必需吃醋或吃酸菜湯，這地方老百姓家家戶戶自己做着酸菜。她們把自己做的酸蘿蔔切成絲，浸在酸湯裡，拿來請我，雖不愛吃酸味却也覺得很可口。新蒸的菘麵捲有一種引人的香味，倒像那新烤出爐的麵包香味。她們和我談，在敵人佔領時，老百姓是沒有吃的，每晌地至多只能收一百多斤，但敵人要他們繳三百多斤，老百姓把家裡一切所有都收集起來送繳敵人，自己只好拔野草吃。現在，他們能吃到菘麵和洋芋，還儲藏着幾缸酸菜。她們歡天喜地的談到減租減息的好處：「現在租減啦，種莊稼的也有得吃啦！當然，他們對革命的政權是擁護的，對革命的八路軍隊也有認識，總說：『八路軍不讓咱們老百姓吃虧。她們的家庭看去是個和睦的大家庭，——這也一定的，農民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家庭也就自然和睦了，女人被打罵，成爲出氣的對象這類情形也沒有了，所以在我遇到的新老解放區的婦女，沒有一個不讚揚八路軍。革命政權和革命軍隊帶給婦女的好處實在多，這是因爲中國婦女是一向受着雙重壓迫的緣故。——翁姑都健在。兩個當家人都在前兩天因事出外去了。那年近六十的老漢，高高而多繃的額角和烏黑的眼睛，高大的個子，顯得還有神采。他好像怕惹人討厭的，一聲不響，悄悄地從他家人身邊走過。我發現他是一個善會人意而有着細緻感情的老農民。他爲我向他的娃兒換得一個騎鞍，用着他那發顫的手替我修理鞍上的皮帶併告訴我

應該注意的地方，使我覺得那麼親切。同行的馬夫是一個急躁而脾氣暴烈的人，這一路來當，他揮動着鞭子，口裡大聲吶喊着咧咧的時候，不單牲口害怕，連我也真覺得是驚心動魄的；每在我跌交的時候，生怕被他看見了，要被當做一個錯誤來受他批判似的。這個老漢却使我想像，如果作為旅途的同行者，一定是不討人厭的。青春從來是美麗的，但我更愛高貴的品質和知慧。

當我坐在他們院子裡的莠麥籬上，暖日的太陽照着，用鉛筆隨意的記一下我的旅程時，他們九歲的大孫子，不管大人們如何喊他走開，不要打擾我，他還是依依地靠在我的膝頭，看着我寫。「歡喜唸書麼？」我問他。「歡喜，」他回答。「爲什麼你不唸書呢？這裡有小學堂麼？」是過去是有的，咱們不唸他們鬼子的鬼書，全是鬼話，」老漢走過接下說。以後你可以唸書了，唸咱們自己的書，中國人的書！」我撫着孩子的頭說。「日本鬼子到何家來過麼？」過來」。他們來做什麼呢？」「他們跑進我們家裡來，說『請教請教的，』把我們雞棚裡的雞捉走了，」莠麥也裝走了，雞蛋也拿去了，他們什麼都要，我的褲子他們也要。小孩說：「他們還拔出刺刀問我爺爺：『什麼的幹活？……』」把我爺爺打倒在地。」「老漢感慨的說：「受够罪了！偏偏還不死！」「你不能這樣說，你還要活呢！還要讓你看見一個繁榮的新中國，還應該讓你過一些快樂的日子！」我對他說。

在那裡人和牲口都吃飽，飲飽，休息够了之後，我又上路。黃昏時分，到一個小村，我們停

下休息併飲水；當忽然，我轉過頭來，看見一個指鎗的人，緊緊的立在我的身旁，不覺怔了一下。『問你是做什麼的？』『我是來保護你的。』他傲然地說。『你幾歲了？叫什麼？』『我叫馬三笑，二十歲。』他回答：『你是什麼時候參加八路軍的？』『已經參加了四年。今夜我的任務是送你安全地過路去。』我爲他坦率的傲然的口吻所感動，同時却覺得需要一個才二十歲的青年來保護，好像自尊心受了傷似的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但我是了解這位青年戰士的心理的，這麼年青，他已有四年的戰鬥歷史。做一個革命軍隊的戰士，是多麼的光榮，多麼值得驕傲的事！用不到我來替他們宣傳或誇讚，他們自己的行動都將是一個正確的證明。我甚至要說，恐怕找不出比八路軍好的軍隊，他們的紀律以及他們對於老百姓的愛護，他們是中國這一代優秀，青年的代表！我衷心尊敬他們。『這樣說來，我們已經到了危險地帶了？』我問：『還沒有。』他回答的話都是斬釘截鐵的，一個字不多，一個字不少。

我們出發不久就過一條河沿，我的牲口竟頑強地不肯過河去，好像被什麼東西所驚嚇，儘在河亂乘竄着。我用力打牠但柳條鞭子一點也不生效力——這一路來，每天上路總要找一根樹條，把驢子打着走，同伴們笑我『出洋相』——幸而馬三笑的鎗托一下就把我趕上了前邊的人，整個夜行軍中，都是依靠他的鎗托，使我不至於離前邊的人太遠；但我覺得很抱歉，因爲，顯然這決不是他的任務。牲口跑着跑着，跑過高山，跑過碎石子路，牠迅速地跑着，竟使我覺得在這夜裡，

牲口的脚彷彿了似的，矮得已經接近地面。四週是靜寂的，只有馬蹄得得的聲音，單調地從地面上滑過。馬三笑一直在我的旁邊。我們只聽到敵人的六響擲彈筒，什麼事情也沒有遇到的過了同蒲路。

人們不是被瞌睡，就是被口渴所困，多數是被瞌睡所困；有的人甚至在馬上臃腫而跌下來的。但我却清醒地望着那閃爍在天空的北斗星，好像發光的眼睛，不禁痴痴地想：今夜，可會有遠方的朋友，當埋頭在工作中的不眠之夜裡，想到有人是在跑着路過夜的麼？

當我伸手從棉軍裝袋裏摸出兩個餅子，遞送一個給馬三笑時，不知什麼時候，他已離我而去了。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

生活的體驗

廣武一宿

我們正一夜和二天半的時間裡，走了近二百四五十里路，其間只在過同蒲路以後，在一個小村莊裡喝水，休息三小時；到達廣武鎮時，人和牲口都很疲憊了。

廣武鎮留給我一個變態的印象。我所接觸到的當地人，對我們都極殷勤，殷勤到使人感到不自然，使人摸不着他們的心理。誠然，這八年多來，他們在敵人統治下所受的委屈，所受的摧殘，是在根據地裡的人所不能想像的，但今天，他們重又投進祖國的懷抱，見着自己的兄弟姊妹，該是多麼的歡欣呵！盡情的流你們快樂和苦痛的眼淚罷！盡情的訴說你們所受過的一切罷！別再像驚弓之鳥了，過去的是過去了，將永遠不再回來了，你們將被民主的政權和革命的軍隊所熱愛，所關懷，再沒有人敢於來踐踏你們了！

我們到一家飯館吃飯，館子只有羊肉包子，不會炒菜，自然也同意我們買菜來自己炒，

正在交涉的時候，一個穿着短衣褲的，使人看去好像是有些灰溜溜的人，熱心地告訴我們：『那邊巷裡有一個好館子，跟我來！』我們爲好奇心所驅，便跟他走去，在大街轉角的一條小巷裡，黑漆的大門上，寫着四個白色字：『此門賣面』，如果不是這個引路的人對我們早已有了解，我們真會被這四個字引起一些奇怪的誤解。

我們讚美着麵和菜做得合味，便問主人爲什麼不把這館子開到交通要道上去呢。主人長吁一聲，帶着名士風流的口腔，告訴我們說，他做這小買賣，並不當做一個什麼事兒的，只是爲着消遣；他感嘆整個廣武鎮沒有一個好館子——這倒是事實，也沒有懂得做菜的人，而他，只願意把他的技術給知音者去欣賞。他又告訴我們，以前他在包頭做過廚司，一九四〇年，他回到家鄉——廣武來。他還和我們談他對於漢奸的看法：漢奸有幾種：有自動做的，有被迫做的，有死心地做的，那個領我們來的人在旁邊殷勤地給我們送茶水，我們問他是做什麼的，他回答說給飯館主人幫個忙的。他們招待得這樣客氣，竟使我難過起來。我愛熱情、坦率、而天真的人，從來受不起阿諛和逢迎，天！願我們消滅這些醜惡的字母，我們再不需要使用它們，我們是人，願我們彼此用二人一樣來平等對待着。

夜裡，我睡在一家老百姓家的炕上，望着屋頂的天花板，糊滿了敵人的報紙和雜誌，一張偽蒙疆新報上登着頭條大標題：『孫良誠將軍翻然覺悟，率所部參加和平陣營，』小標題：『即被任

總第二方面總司令」。想到我們的國家和人民，我們會受盡了敵人和自己的敗類的：種種污辱，現在，人民用血來爭得了勝利，用血來洗刷了我們的污辱，這許多事實，是決不容許歪曲的，抗戰的歷史將必需用真實而正直的筆法來記述。正想着，院子裡送來小孩們清脆的歌聲：「什麼花開花朝太陽，什麼人擁護共產黨？迎春花開花朝太陽；老百姓擁護共產黨！」雖然廣武鎮解放了才兩個月，老百姓的大門口還貼着敵人佔領時的荒謬春聯：「維新」，「共榮」；但孩子們却已唱開了新鮮的歌曲，夾着愉快的笑聲，從院子裡直送到街上，遠處。

祝福你，廣武和廣武的人民，相信破碎的鎮子不久將建設起來，人們將挺直胸膛，變得爽朗而且快樂！

生活的體驗

從廣武以後，接連五天我們都是爬着高山，即使偶而遇到有一、三十里平坦的路，那也是極難走的碎石子路，整天，我們是翻過一個山嶺又一個山嶺，直到北路口，走過恆山。在從界河口到崑嵐的路上，我已經開始認識山西的山，是這樣的嚴峻、枯燥而難行的，可是，我還不知道更嚴峻而難行的山是在廣武後的一段呢。有時，我幾乎是爬着走的，有時，攀援着荊棘走，有時，拉着驢子的尾巴走；但是只要走着，那怕是被雨雪所浸濕，或是鋪着浮沙的極難走的高山，也還是

擋不住我們的脚步！有一、二天，我們是在呼濠河的邊沿高山裡轉着圈子，當我們到達山頂，便望見了呼濠們河，當我們走下山坡，我們眼前又消逝了這條斜放着的帶子。就在爬着這些高山的時候，我沉思，并彷彿自以爲開始懂得一點什麼叫做「生活的體驗」。假定在一個長夏的清晨，坐了滑竿上娥媚山去，在轎子裡的人玩賞着山景；可是抬轎的人呢，他也有心情讚美和欣賞山景麼？我想，他一定只願望早一點跑到目的地，早早掙得他的報酬，那是他用以養活一家老小的。他多半會這樣想：「怎麼老跑不到呢？」我自以爲在這個時候，我是懂得做一個轎夫，一個樵夫，和山居的人的情感——我也覺得了解那駝東西的牲口。人就在體驗着生活的時候，情感是變得現實些，變得接近大眾些，享受和剝削的情感也就自然會淡起來了。這高山是多麼的美麗，像一塊削壁似的插入雲天，那麼，好罷，請你走走看呢！

晉西北的山是遠遠的拋在後面了，但這五天的行程，留給了我一些新鮮的悟解。

民

兵

我們停了一個村莊名新窰。這地方離繁峙和寧武只有五、六十里，那兩處都還有敵人。

夜晚，我睡在一家老百姓家的外間，一個大炕上。一會，院子外的狗叫了；又一會，主人家的小豬來頂門了，一個農民青年高着聲音在院子裡和屋主入講話，我不很懂得的山西話，接着，他

推門進來，出去又回來，整個黃昏便是這樣的不寧靜。最後，我索性燃着洋蠟，穿起棉軍裝，坐在炕上，不準備睡覺了，當那青年農民又推門進來，在那木櫃上不知摸索了些什麼東西而要出去時，我忍不住有點不愉快的問他：「你們夜裡不睡覺麼？」他靜靜地回答我：「我們不睡覺的！」「這簡直是開玩笑！」我起來一邊頂上門，一邊被他的回答所惱，便喊起來：「真討厭！請你不要再進來了！」好像他是聽得清清楚楚的，大約在院子的門口罷，依然是靜靜的回答：「好，我就不進來了！」「這地方人和狗都不可愛！」我嘆氣。多麼煩擾的夜呵！多麼厭煩的狗聲呵！這裡，那裡，四處都是吠聲，一大吠影，百犬吠聲，成了這一晚上的真實情景。剛剛羣犬的吠聲消逝下去，而我也朦朧的快要進入佳境的時候，忽然一隻狗汪汪的大聲吠了幾下，於是，整個村莊又完全被包圍在狗叫聲裡了。

次日大早，當我帶着一些懊惱的情緒，走出院子去，看見大門口有一個民兵，腰間掛着手榴彈，在放哨。一看，那就是昨晚進來又出去的青年農民，原來爲着我們幾個人過路，村裡的民兵都出來給我們整夜放哨的。一個旅伴對我說：「你總說碰不到一個民兵，是一件憾事，乃至碰到了民兵，你又說『真討厭！』」我笑了，覺得很抱歉，但又不知道怎樣向這個民兵表示我的歉意，終於，當我離開這個院子上路時，從他身旁走過，「真對不住，苦了你們了！」我說。「那裡的話，只要你們很好就成了」。他回答着，微笑了。

崇高的友愛

山分水嶺到蔡家溝去洪水河的山嶺上，七、八十里無人烟，但我們平安地走過這些高山，沒有盜匪，也沒有遇到一個壞人。共產黨使這些絕端分散在山嶺中的農村，由於發動生產，減租減息，生活是繁榮起來了，人民都能自己管理自己，而且管理得這樣好，並且，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改善得漸漸接近到理想的地步！我見到在民主政權的培養下的中國今天的農村，是這樣進步了。無論在經濟建設上，在政治覺悟程度上，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這種進步，是我從前所不會想像到的。

好像就爲得證實我這個思想，在前面的陡坡上，一個穿黑布衣服的老百姓躺在路邊，老鄉，你病了麼？走不動麼？我扶你上我的牲口走罷！躺在這裡要着涼了！一個穿黑布制服的工人，一邊說一邊去扶起那躺在路邊的人，把他扶上鞍子，緩緩地爲他牽着牲口走。我還聽我們在親切地交談着，那村人，去那裡，做什麼。

我是那麼的快樂，甚至快樂得要流淚了，爲着目睹人類最高貴最美麗的行爲，我願意把其它一切的醜陋和罪惡都忘掉而且都寬恕了！

是的，沒有共產黨，沒有八路軍，這些地方將是一些不可想像的地方！

桃 花 塢

走了近二十里的平坦路，到一個面臨河流，被水桐圍繞着的村莊名桃花塢。

我住的老百姓家，姓張，一家五口，老夫婦倆，大兒子有二十二歲，私塾教員。二兒子十一歲，女孩十五歲，生得還整齊。他們有一排四間正房，我睡在他們當中一間的櫃台上，那一間裡供奉着亂七八糟的各種神仙：「大仙」「灶君大王」「富貴神」……

這地方敵人已一年不到。房子很整潔，牆壁上粉得白白的。我從這家人家出發，往全村去踴躍了一下，覺得不但這一家整潔，整個村莊也都是整潔的。如果在國運興隆、政治修明的年月，這方真可以成爲世外桃源。但現在，敵人摧殘的痕迹還很深，這樣冷的天氣，還有不少的小孩是完全赤着下身的。這一帶的老百姓很迷信，家家都供奉着各種各樣的神仙；北路口竟使我有這樣的印象好像每條街的十字路口都有廟的，那些從不見經典的廟名，伏魔宮等等的殿裡，放着許多塗上大紅大綠的艷麗顏色的塑像，使人覺得在敵人佔領的年月裡，真是連神像也都鬼子化了。

在私塾教員的家裡，看見一份十月十一日的翼晉羣衆報，年青的張先生是這個村裡的唯一知識份子，能寫能算。在這村裡他們是小有產者。「你的媳婦呢？」和他們一家聊着天，我問。老太太回答我：「父母娶來的，舊派的，面上長一個疤，他不要了，回娘家去了！」指着她的長子，驕

傲的口吻說。「那麼讓他自己找一個情投意合的，美麗的，年青的。」我微笑着說。「可不是。現在大人也管不了他們的事了！只好由他自己找去！」老太太說。兒子笑着接下說：「還沒有找到對象。」這農村的知識份子所表現的第一個反抗舊社會的行動，却是離婚，使我覺得五四的時代是並沒有結束。但我覺得即使在我們理想的社會裡，婚姻的穩定性也是很難說的。也許——但願將來能到那樣的時候：兩性的選擇完全可以自由，不受物質條件的限制，兩性的結合純粹是爲着愛情，到那個時候，離婚將變得現社會上的理想夫婦一樣，很難得的事了。

次日清晨，當我離開桃花塢，地面上鋪着一層濃霜，地裡結了凍。這情景使我想起周邦彥的那幾句：「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幾個早起，的婦女和小孩立在門口，送我們走出村莊去。」你看她多麼威武！「威武乍咧！」另一個說。前面還有很多的高山，和難走的路，但是阻擋不了我們走的心，走罷！我依然擎着一根樹條，上路了。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張垣四日

去天鎮的路是一條開濶的公路，沒有什麼山坡，但一直是微微地向上陡着。房東趙先生會對我說這條路高起一點高起一點，好像是接上天去似的。當然，我們誰也沒有走過上天去的路，但那一天的路程我們是走得那麼愉快，因為，心裡有一個希望：一到天鎮，可以棄馬坐車了。

人疲了，牲口也疲了。牲口是我們長途行軍的最好伴侶，聽說紅軍長征時，曾有這麼一句話：『娘親爺親，不如驢子親』。牲口是這樣被重視着的。是的，如果沒有牲口，我想也許不可能走這麼多的路。我們的馬夫常常用好些話來咒罵牲口：『人老則好，看來牲口老了也是好。』罵得使我們笑起來。牲口在經過了一個多月行程之後，變得很疲懶了，也許是由於經驗，柳條鞭子已經不產生效力，我的驢子在走了二、三十里路後，牠的後腿就一顛一顛的，馬夫說牠好，想把人顛下來；的確，這個毛病是以前所沒有的。

我們在天鎮過一晚，次日早間，便去車站候車。這裡每天都有客車，老百姓魚貫的在售票處等候買票。十時左右，正當火車到站時，來了美國飛機，在車站上空，低飛徘徊，偵察很久。老

百姓都翹首而視，并報之以抗議的聲音。

下午五時左右，我們到達察哈爾省城張家口。這城市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彷彿有杭州那麼大——不把西湖算在內——其實是及不上杭州的大。一條大清河把它劈成兩塊。張家口淪陷了已九年多。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起，敵人在這地方設立了偽蒙古自治政府。敵人會那麼處心積慮的來統治張家口，計劃以十五年的時間，接連到重工業區的宣化，成爲大張家口。在敵人佔領的時間裡，老百姓是吃盡了苦頭，敵人的統治是那麼嚴密，除了空氣之外——便連空氣，老百姓怕也不敢自由呼吸！真是什麼都統制起來了，實行嚴格的配給。捐和稅的煩重，出於常人想像之外。就拿飲水這件事來說罷：敵人把所有的水井都統制起來，有一個「水井組合會」，把水價提得很高：每擔水要二十元。單單水的稅收，每月也達六、七〇〇〇元以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八路軍從東山坡那邊沖進張家口，解放了該市。當時，敵人正燒好午飯，準備吃飯，拿起飯碗，聽到八路軍已進來，便拋下飯碗，倉惶往北平方向逃走。

今天的張家口是充滿了活潑、新鮮的氣氛，它在晉察冀行政委員會和晉察冀軍區直接領導之下，各種事業都是蓬蓬勃勃的。水和電都暢通。人民自由貿易，市面熱鬧；工廠已復工，工人的工資提高了；復仇清算動運已經進行得細緻而深刻，罪大惡極的死漢奸有的已付諸極刑，有的扣押起來，準備公審。社會秩序良好，特別是軍風紀的嚴格，值得讚美。老百姓可以自由的在街上

行走，但穿軍裝的人必需有通行證，必需是有事才可以外出。因此，我雖然做了軍區司令部的客人，却爲着穿的是軍裝，而不敢隨意往街上去躑躅，免得弄的不好，被抓起來，才是有趣的笑話。

老百姓對八路軍尊崇備至，並且都把他們神話化了。解放大飯店的侍者對我談那天八路軍打進市來的事情：『不知道他們從那兒來的，他們進來的時候，日本人家棄放在桌上的飯還是熱的呢！』

每天上午十時到十一時，美國飛機總要到張市上空來盤旋偵察，有時幾架，有時十幾架。我在張市四日，只有初到的次日，夜裡下過雨，天色是陰暗的，美國飛機沒有來。餘三天，天天都來。這種舉動，在中國人民心上留着深刻的印象。我相信這是遺憾的事情，而美國的廣大人民，也不會同情這類似的舉動。

成仿吾先生領我去參觀了一次晉察冀行政委員會的辦公廳。穿過清水河，因此得環遊了張垣全市。接着，我又參觀了晉察冀日報館和它的印刷廠，訪問了工人報的主編者吳小武先生，婦聯的李實光和李殿影二女士。

晉察冀日報和延安的解放日報一樣大小，最初，當一九三八年八路軍到阜平時，開始辦的報名抗敵報，是石印；一九四〇年，改爲晉察冀日報，鉛印，初用老五號，後改六號字。張市解放後，由阜平搬來出版。每天印二萬七千多份，每份售價邊幣五元。現用的器材是敵人遺留下的，

有一輛現代化的輪轉機。

吳小武先生和我談了工人報的情形，也是從阜平搬來的。工人報只晉察冀日報一半大，準備從明年一月（一九四六年）起，擴大成晉察冀日報一樣版面。它現在是三日刊，每期印二萬份左右。編排得很活潑。有好些工人的通訊。吳先生還和我談了晉察冀的工業建設和民兵英雄李殿冰、李勇、賈玉，以及冀中地道戰等的故事。我初以為他是一個工人，後來才知吳先生是個知識份子出身——曾是杭州工專的學生，在晉察冀，在敵後工作已很多年，和實際工作經驗的人作一夕談，真是勝讀十年書。李殿影女士告訴了我許多關於晉察冀邊區婦女在抗戰中所做的工作，以及她們今天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的地位提高了等種種事實。

我對於晉察冀邊區，充滿了仰慕的心情。去年九月，在延安遇見從天津逃出來的法人 *M. Tine* 先生等七人，他們那麼地讚揚這個邊區的好：阜平什麼都好，八路軍好，八路軍的工作同志好，老百姓好，鞋子好，被子好，真是沒有一樣不好，而民兵更是了不起的英雄。

我問：『好在什麼地方呢？』*Melhard* 先生說：『工作人員是誠懇的，老百姓是熱烈的；至於鞋子，那是結實的，您看，』他指着他腳上的鞋子：『這是我從阜平穿出來的，您覺得不好看麼？但我就靠着這雙鞋子走到這裡來的！走了這麼多路，還沒有破。您沒有到過前方麼？』他笑起來：『我要說我比您了解中國！』他們也稱讚晉察冀的軍事工業建設，冀中軍民關係的好。當時

我會很奇怪，在延安住了這麼多年，也遇見過一些從前方回來的八路軍工作人員，但從沒有聽他們談過，也許這些事情在他們做的人看起來是一些平常的事，而不值得一談麼？在我，覺得沒有能夠到阜平去看看，是一件憾事。

從張家口各方面的工作情形看來，使人覺得這地方是充滿了共產黨裡的人才——就是說，優秀的幹部，他們和人民在一起管理這個城市，顯得綽綽有餘的樣子。

華北聯大也搬在這裡，聽說還要辦一個藝術學院。民衆劇院正在演出李自成。口外的老百姓歡喜看洛子（上海稱做蹦蹦戲），這種戲的特點是充滿了風騷和低級趣味；但如果把它改造，放進新內容去，對觀眾不再是單純的娛樂，也有了教育的意義。據說在我到張家口之前，曾演出「鎗斃漢奸楊小脚」，是改造了的有新內容的洛子，很受老百姓的歡迎。張家口的文化工作也顯得很活躍，可惜在我還沒有能夠更多的了解這個城市的時候，却不能不離開它，重又上路了。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

無人區和人圈

從張家口坐火車到壞來，才下午三時左右。在壞來停宿一宵。壞來以後，我便又騎牲口了。蒙晉察冀軍區司令部調了一個馬夫、一個勤務送我。那個馬夫姓李，河北人，他是從阜平來的，是一個農民出身的共產黨員。李同志約有卅多歲，沉默而寡言。依然覺得法郎士的話是對的：「討厭的人比討厭的書還要討厭。」我從來不愛那些爲着一點瑣碎小事而整日嘵嘵不休，或是言不及義的多話的男人或女人。這樣的人面前，我真覺得我的耳朵還是聾了好。但是，在現社會裡，也還有契訶夫所寫的那類人，那麼在某些場合，裝聾作啞，也是必要的了。老李同志有令人不討厭的長處，特別，他對我和牲口是這樣的負責，這回，倒不再是我自己怕掉在路上，而是他怕我掉在路上。我從這個農民黨員的行動上，了解一個共產黨員和一個平常人不同的地方：當一個黨員他被分配到一個工作，那麼他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無論有多少的困難；而一個強的黨員，有鍛鍊的黨員，他對於任務的觀念是極重的。

從壞來到古北口，我們所走的路和偽蒙軍李守信部——這時候已變成中央軍了——的駐地

是成一直線的，最長的距離是四、五十里，短的只二、三十里。我所經過的地方的老百姓，談到偽蒙軍，沒有一個不咬牙功齒的痛恨。偽蒙軍的拿手好戲是向老百姓『襲奔』，在後半夜，或在天快明的時候，突然跑進村莊來，奸淫搶劫，無惡不作，如果有八路軍的工作人員一落到他們手裡，那麼日本人所用來殘殺中國人的那一套：灌煤油、弓打、完了活埋，也都用出來。

行軍的第三天，我們又開始爬高山。上午走了約十里路後，進入熱河省界；下午踏進了從前的『偽滿洲國』，便是從前敵人的『皇道樂土』。一路我們看見被折毀或燒掉的房舍所遺留下的瓦礫堆。村莊都用土牆圍起來，每個村莊的圍牆門上，用磚砌成一個醜惡而原始的形式：好像好萊塢的影片裡所假想的原始人手中所執的武器，或者，像陝甘甯邊區過去的巫神所用的三山刀。圍牆上有着白底黑字：『建後部落。自興鄉土』。這便是敵人所創造的無人區和人圈。敵人把我們堂堂的有悠久文化的民族，侮辱而賤視為『部落』。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我們在楊柳樹底下村打尖，村上的男女老幼圍着我們，看我們吃紅薯——是這條路上唯一買得到的糧食——孩子們赤着下身和腳，大人們襤褸的衣服，在這樣的季節，看不到有穿棉衣的。有一個同伴從包裹裡拿出在張家口買到的白糖來吃，小孩子們好奇地走近去問：『那是什麼？』『是糖。』『糖是什麼滋味？』『甜的。』給我吃一點兒罷！我的手指上生着瘡。一個小孩子向同伴伸着手。『給我一點兒罷！我的眼睛痛。』旁邊一個孩子擠上去。『給我一點

兒罷，我百咳嗽病。」一個年老的婆婆走上前來。「忽兒，那位同伴把一斤白糖分完了。」

當晚我們宿於崎峰茶，這是一個典型的敵人所謂「建設」的部落。所有這個部落裡的老百姓，都是敵人從別處的村莊趕攆來的，老百姓拋棄自己原來的家舍田園，屯集到這地方來，要一樣沒一樣。敵人把人民屯集起來，一則是便於他的統治，二則把那些自然村莊消滅之後，變成無人區，使八路軍的游擊隊難以存身。人圈裡的房子，都是一式一樣的一排一排的倭土屋，就像圈內的豬圈，羊圈一樣。沒有一個人穿着完整的那怕是舊的衣服，千瘡百孔，一點也不是形容。人人面黃肌瘦。一個老漢對我說：「八路軍要再不來，我們也活不成了！我們都要凍死餓死，快要絕種了！我們村裡從前有四百多戶，現在死得只剩一百多戶了！」老人顫着聲音，我彷彿見他落下了淚。在敵人統治的時候，每年春耕時，敵人把老百姓編成隊，排了隊到他們原來離田舍不遠的土地上去耕種，來回跑幾十里路，晚上再排隊回到人圈裡來。

看到這地方只有紅薯，我便問一個老百姓：「爲什麼你們不種點蘿蔔呢？」我們不種蘿蔔，他回他答我：「因爲鬼子一見蘿蔔就拔來吃。明年我們要種蘿蔔了，」他微笑起來，「明年咱們愛吃什麼就種什麼。」農民對於解放了他們的人——八路軍是感激的，道理很簡單，就是這個老百姓所說的：「明年咱們愛吃什麼就種什麼。」他又告訴我，熱河省政府已有命令下來，農民可以取得農貸。明年，我想這地方農民的生產情緒一定是高漲的，因爲他們都將爲自己而耕，而且

是自由耕種了。有些農民，他們已經從人圈裡搬回從前自己的住處，搭個草蓬，住起來了。

夜晚我睡在一間土房的破櫃台上——屋頂上掛了好些烟草葉子，直垂到我的頭上，同伴們說笑話：是無數的纏絡。老百姓男男女女都跑來問我：『你有爛襯衣麼？你有爛褲子麼？』也有人說：『把你這雙鞋子賣給我罷！你身上穿的毛衣多麼暖，旨實麼？』多麼遺憾，除了身上穿的以外，我也只有一肩被褥，便連幾雙破袜子，也早在山西境內時，送給老百姓，拆來當『線用』。洋。我向：『這地方沒有布買麼？爲什麼不買點布來縫件衣服穿襪？』『唉！何那裡知道？買布麼？布是日本鬼子配給的，我們一家六口人，一年配給我尺布，一個人穿都不够。你買布穿麼？那是國事犯，不但布被沒收，還要罰錢坐牢呢！誰敢買布？有錢也不敢買。』

真的，我們從根據地來的人，一下子是不容易了解在敵人統治了很久的地方，人民所受的苦痛。但願我們中國人不要忘了我們的同胞和土地是被日本鬼子這樣踏踐過，這樣奴役過的！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二日

被摧殘的農村

我們開始走較平坦的路，又馬着就要進入一個新解放的縣城，渾源縣，希望在那裡可以休息一天，心情是愉快的。但出發不久，就聽到一個消息，大同敵人千名，帶着二十輛汽車，出來搶糧。我們過渾源城才下午三時左右，匆匆地穿過縣城，這是一個比五寨還大得多的城市，街道寬闊，磚瓦房舍也很整齊，小攤羣集在街道的兩旁；大商店也都開着門，市面顯得很熱鬧。老百姓成羣結隊的在拆碉堡。街道旁貼有好幾種壁報：羣衆報，黑板报……也留有華北文工團的街頭詩，以及其他新的標語：擁護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擁護民主政府，府中國人民解放萬歲……

我們停宿在離城十里的一個村莊。我住的人家姓郭，寡母和弱女，是正中屋子裡的郭老秀才的姪兒留下的妻女。母親四十三歲，女兒十五歲，十九歲的兒子是去年走的，照他母親的估計是參加八路軍去了。她們母女倆用着那樣的熱情來招待我，竟使我忘掉了自己的疲勞。她們連連說：『不是這樣的時勢，請你也是請不到呵！』我和她們同睡在一個炕上，她們脫掉棉衣，上身就只剩了一塊像肚兜似的布，在陝甘甯邊區，好幾年以前，老百姓的小孩身上也還見得用根帶子繫在頸裡，

胸和臂都是袒着的。當然，這和西洋女人爲着禮貌和時式而穿着袒胸露臂的衣服是絕不相同的；也許這地方通行這樣的襯衣。但我相信一定和貧窮發生密切的關係。她們告訴我，這地方不出產棉花，布很貴，並且，在敵人佔領的時候，誰買得起布呢？她們穿不起衣服。我爲她們單薄的衣服，單薄的被子，爲她們清苦的生活，更爲那慈母思子的心情，輾轉不寐。我記得在從前有人罵過我是得福不知享的人，說我一輩子將沒有幸福的日子，我覺得這是罵得正確的。直到我還要遇着吃不飽穿不暖的人，我相信我是不會愉快也不會幸福的。如果說是幸福，那將是在替大家謀飯吃謀衣穿的工作中，得到的才能够說是幸福，此外還有什麼幸福呢。郭姓寡婦對我說，她守寡已十四年，今天只有母女相依爲命了。她這樣想念她的兒子，當夜晚，在睡夢中突然醒來時，總彷彿聽到有打鬥的聲音，以爲兒子回來了。『他會回來麼？』『爲什麼不呢？』我安慰她；戰爭結束以後，他會回來看你。應當懂得他，年青人是有血氣的，誰願意老受敵人的欺壓呢？他自然不肯守在家裡。』她好奇地問我：『你不想念你的親人麼？』我說：『我差不多沒有什麼人可想的了！』但說出口之後，立刻覺得這話是不真實，也不公平的，因此便補充：『想念又有什麼意思呢？當你見不到的時候，想念也是無用的。我有這樣那樣的事情要做，這就使得我的心思沒有工夫去想念什麼親人了。』可是我的心，就在這時刻，被遙遠的懷念所擾，好像負了罪似的。女孩子知道我是識字的，便要我寫幾個字給她看，她會過唸二年書，我勸她的母親把女兒再送去村中

的小學校唸點書。好像要加深留在我心上暗淡的影子，夜深時，天落起雨來，打在高梁幹堆上，點點滴滴的。天還沒有亮，她們就起來給我燒開水。那晚她們也沒有睡好，我覺得當我翻一個身的時候，她們也都驚覺的，彷彿真是自己的一個親人，睡在身邊，母女倆的情感都是那麼細緻。我請她們不要給我燒開水，做母親的回答：「不是爲了你燒的，那是因爲我們自己冷。」

雖然是陰天，路又泥濘，我們還是前行。過瓦嶺關時，括着冷風，下着又大又密的冰雹，衣服都濕了。我們停於望狐村。村子有一百多戶，今年七月十三日，敵人才被趕走。臨着村莊的高山上，有過礮堡，過去，敵人經常留在這村上的約二、三十，僞軍和僞警有三、四百人。老百姓日夜侍候這一輩魔鬼，真苦極啦！「房東趙姓的婦人對我說。他們一家五口，住着兩間破屋。她的大兒子才十四歲，以山上打柴回來，這麼小小的年紀，已經分擔了一家生活的責任，他的一隻眼睛瞎了，面色蒼老而嚴肅，好像有不少的隱憂，我相信，從他有生命以來，他一定很少見到過笑容，因此，他自己也不會笑了。」媽，你去看看，够燒五天麼？天像要下雪了？」他跨進門來，對母親說。母親對他的態度像對一個當家人那樣的尊敬和關切，她急忙地從炕上下來，指着鍋子說：「還熱呢，快吃罷！」還特地給他兩個用棒子粉做的窩窩頭。但她和她的兩個較小的孩子，只吃那放在水裡煮熟的洋芋和酸菜湯。

這個村莊的住屋，大半是土窯洞式的門，和延安的窯洞門又不同，這些窯洞的門頂是尖

圓的，別緻地，使人想起峨特式的教堂頂。

街上除了有一處賣牛肉，一處賣羊肉，和一擔葡萄之外，什麼也買不到。這是長年被敵人收括盡了的村莊，人和土地都這樣瘦，只剩了皮和骨頭。偶而從村人的臉上看見一個笑容，在他自己好像是不可公開似的。就像這些幸免於難的樹林和房屋，有時從山彎路轉的地方，一叢參天的水桐裡，露出一角黃土牆，牆上寫着七歪八倒的「留人小店」幾個字——也有寫着「劉人小店的」，并不使人感到那些古詩人們和古畫家們的意境「一行到山窮水盡處，柳暗花明又一村」。這當然因為我是一個現代的中國人，雖然我沒有生活在這地方，戰爭曾給我很多的負擔，戰爭留給我的傷痕也很深，我要求的是現代的中國式的繁榮的農村，像陝甘寧的農村一樣，我相信不久的將來，這地方是能做好的。

十一月十五日的天早，我們離開南徐堡，渡桑乾河。在星光下，我們步行到河邊，天正亮了。昨晚，聽說已經僱好船渡河。霜很厚，近河的沼澤地上，結着薄冰。河身并不如我想像中的濶，但水流很急。沒有見到船，只有牛車。「難道這就叫做船麼？」有人回答我說：「這就是。」但過後，我聽說桑乾河上有些渡口是有船的，和牛車不同，人家是在和我這個生長在魚米之鄉的南人開玩笑而那樣說的。人和牲口到得河邊，都站住了，有些望洋興嘆的樣子。一個同伴騎着牲口，一馬當先，如履平地的向河中跑去，牲口和人一下子都落入水深處，一個漩渦把牲口轉在水中打

滾，大家以爲牲口是無救了；但那個同伴很鎮靜，他那高大的個子，一躍從水中立起，把牲口一把拉住，牽着，從水淺處走過河去，全身衣服可是都濕透了。我坐在一輛牛車上，趕車的老鄉穿着翻羊皮襖，哈哈笑的吆着牛，——這聲音是這樣的奇特，如果不是親臨其境，那麼要以爲這是一種宏亮的笑聲。可是才行到河身的三分之一時，那轅牛再也不走了。不管牛車主人揚起他的鞭子怎樣地威脅着，怎樣地哈哈笑的吆着，坐在牛車上的人也幫助他虛張聲勢，牛却總不前行，連動也不動。牛勁，牛的執拗，就是這樣。老鄉只好將下身衣服脫掉，把車上的一個男同志措過河去，減輕一點車載的重量；然後把第一個牛牽着，我們用柳條鞭打着轅牛，吶喊着，才渡到了對岸。僅僅渡過這條河，費去了近三小時。就在這渡口，留有八路軍光輝的戰績，敵人有一個團是被革命軍隊完全消滅了的。吆牛車的老鄉，個個都知道這件事。

當晚我們停在一吐泉，我宿在一家趙姓家的小土窩裡。當我一腳踏進他們的門，我的情感在一刹那間被正中懸掛着的，但着紅色的棘心的耶穌像，和聖母懷抱耶穌的像所激動，我想起伏日山中和洛阿爾河邊的法蘭西的謙恭，樸素的農家和農村小旅舍，於其說是出於信仰，無寧說是習慣，懸着一張聖母或上帝的像。國外的日子對我是這樣值得紀念。祝福你，自由，民主的法蘭西，新生的法蘭西我記得我從來都是被房東厚待着，有一次，女房東爲了不讓我走，甚至把我的行李都藏起來了。我耳朵邊還彷彿聽到朋友們要我收回「永別」而說個「再見」的聲音。

趙先生夫婦在年青時會做過小學教員，好多年來，趙先生已變成莊稼漢了。因為他覺得在窮人壓迫之下，沒有什麼可言教的。現在夫婦都已過了四十，他們跑過不少地方，北平、張家口都住過。談起來，很開通，胸襟是寬大的，開朗的。他告我每期的晉察冀日報他都看，對於民主，他有一個簡單、樸素而正確的見解：咱們人民自己做主人。這還是五四時代的人物。他們的大兒子在村上做事情。這些小小的土密，被他們收拾得異常潔淨，愛潔淨，這恐怕也是天主教徒的特點。村裡一百多戶，大部份人家都是信天主教的。

晚上，和趙先生夫婦談聖經，他們竟以爲我也是教徒。他們問我，共產黨八路軍是否將來會禁止信教，我說事實不是早已證明共產黨對於信教是自由的，難道你們受到什麼限制麼？他們笑起來，說，「不，我們進教堂做禱告，什麼都是自由的。」

在小土密裡，我聽着隔壁天主教堂裡的鐘聲，想起當那無邪的童年已經遠去；當那些讀神話的日子已經過去；「再見再見」何時見，一別匆匆又十年，在這次戰爭裡，好些人都會各自已近十年的事故可敘述罷。

一九四六年二月七日

赴承德道中

我們從熱河又進入河北，當走近大小石圩的時候，天氣陡然暖起來，好像初秋的樣子；柳樹的葉子還是青青的，大貝麻的葉子是綠的，花是紅的，都呈着新鮮的顏色，記得離開延安的時候，那裡的大貝麻早已被寒霜打得枯殘了。這一帶雖偽蒙軍李守信部隊特別近，只二十多里，而且這幾個村莊是常常遭受襲擊的，我停宿於小石圩的晚上，沒有脫衣，馬也沒有解鞍。

過南天門，不久就到了古北口。我們沒有時間去賞識這個城鎮，却因沒有火車，——等待罷，覺不如早走——必須繼續走路這件事，弄得心裡有些不耐煩。老李覺得既然沒有火車，那麼只好走，在他，經過了在革命隊伍裡長期的實際鍛鍊和學習，也知道辯證法的運用了。事情是有變通的餘地，看具體情況而決定辦法，所以當那個勤務不想再送我時，就被他用道理來說服了，決定還是送我到承德。

到承德的上一晚，我住在東營子，一家小財主童姓的家裡。老婆婆見我進門，就叮囑我不要用地爐竈燒飯，因為她受不起麻煩。我告訴她請放心罷，什麼東西都不動用，爐竈也不用，只

睡你們的炕，睡一個晚上。但她仍是很不放心的，叫她十五歲的孫女，在我住的炕沿上坐着，看我做些什麼事，她自己也不時的跑進屋子裡來，當我把裝梳洗用具的小口袋放到她的櫃台上，她好像看見了有毒菌的東西，把她的茶杯等等移到一邊，並對我說這是茶杯，好像我不認識似的。這座屋子除了土炕牆壁，瓦磚爐竈櫃台之外，全盤都是日本貨，日本的鐘，日本的熱水瓶，以及飯碗，茶杯鏡子，雪花膏，香水，甚至連筷子也是日本貨，日本的式樣：：因為覺得她是帶着這麼多厭惡來看待我，使我反而想了解她而願意和她談天了。我問她這地方可常有八路軍經過，他們的紀律怎樣？最初，她帶着傲慢而瞧不起的口吻勉強回答我——那樣子像對待一個走上門去要飯的乞丐——後來她也總算帶着點微笑說，關裡的人都是頂客氣頂有禮貌的，紀律也頂好——沒有話可說的。最後她居然對幾發生起好奇來了，她問我「你唸過書麼？」我識得幾個字。我說。她又問我「你是那裡人？」浙江人。「浙江人，在那裡？是中國人嗎？」對了，是中國人，你知道中國麼？」「呀！中國？從前知道有個中國，那就像日本人他們有個日本國一樣。我們是滿洲國人：：。」她還彷彿覺得她自己已很有知識的。我承認在我的內心是很生氣的，我說：「呀！你倒知道有個日本國！可是立刻我把不高興的口氣改變了，有什麼用處呢。」我想。「我看你像是一個好人家的女兒，」她笑微微的說，這在她算是一句恭維話，但我却像受了莫大的侮辱。「從什麼地方看得出來呢？不見得罷！」我說。她的次子，從反面一間屋裡走來了，——我還不知道

她有這麼一個兒子，——他用着道歉的口吻說：「因為家母年老，自己有病，姪女年幼，很怠慢了。」他又說他的脚上生着瘡，很久沒有出過大門了，什麼事也不知道。和他談起來，知道他在僞滿的時候是做小學教員的，他告訴我在「康德」四年的時候，他就教書的。聽着他自然地談着康德幾年或幾年，我的全身不禁打起寒顫來，在我聽着，這名字是帶了這麼多的屈辱和羞恥，但他却是那麼自然，是習慣了的原因麼？——現在才是你能替國家、人民做事的時候。我說。他不出聲了。他的靈魂好像飄遊在遙遠的天空；——過去的事情像一場夢一樣。——他說。這個小財主是在回想在敵人統治的時候，他曾那麼容易的剝削他的僱戶，用高利貸所積聚的錢財購買這些日本貨麼？十四年的殘踏和蹂躪，在他却是那麼輕描淡寫的說是像一場夢一樣！天呵！怎樣的夢！確實，我是走進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他們所想的，所說的，以及看待事物的態度，對我都是陌生的；不過這是一家小財主，手無分文的窮人不會是這樣的。

次日早晨，當我動身的時候，老婦人已經起來，她自然不是給我燒開水，也不是送我，只是爲着照看她的東西——也許我這樣猜測是不大好的？——當我遞送給她二十元僞幣，她伸手接過說：「不用了，可是她却真誠的笑了。」

我深深地懷念根據地，也沉思很久：在解放了的國土上，等待我們做的工作將多麼的艱巨！去承德的路上，老百姓稱驛站爲「一宮」「二宮」，我們問路時，他們不說多少里，回答我們

從那裡到那裡是一宮或二宮。原來，這是一個由來很久的封建的名稱，當八國聯軍之後，蘇維奔熱河承德，沿途停歇的地方，成爲後來的驛站，但還是沿用當時的叫法：「宮」。

走過灤平縣的灤河大橋，橋底下的一些小販擔，對我喊着：「同志，買點糖吃罷，走罷了。」他們殷勤而帶着天真的喊聲，使我想起根據地裡的老百姓。「你們現在可以做買賣了罷？生意可好？」「還好！」其中一個年輕的，笑着說：「你看，有這麼多擔子，還不好？」「我們現在要買什麼就買什麼，愛吃什麼就吃什麼，」後面趕上一個小販擔子，他歡天喜地的對我說：「嚐嚐我的糖罷，」他遞給我一條，我謝絕了他。但因着他的好意，遲緩了我牲口的脚步，和他隨便談起來。「在僞滿的時候，我們是沒有這些東西的，八路軍來了以後，老百姓才得自在過日子！他說：『也不要忘記了蘇聯紅軍的幫助！』」那是的，怎麼能忘記呢？」小販回答我。紅軍會一直推進到古北口，這一帶的小孩子，對紅軍特別留得很好的印象，紅軍非常愛小孩，有些頑皮的小孩學會了一句俄語「沒有吃」，一見紅軍就用手指着嘴巴，說：「沒有吃」。紅軍從衣袋裡把他所有的東西，錢或是零星什麼，拿出來送給小孩。

在一條公路的高處，遠遠地望見被一些小山圍着的承德市，我的心充滿了好奇和喜悅。在這個城市裡，我打算休息幾天。

九四六年，二月十四日

承德小住

承德是一個受到戰爭摧毀的城市，市容雖然還是完整的，但不少市房遭到破壞，因為，蘇聯紅軍在推進到承德的時候，日本鬼子在這地方曾作了垂死的抵抗，戰爭在市內進行，為解放承德，消滅日本法西斯的武裝，紅軍曾有一些犧牲。就在通到舊時皇宮——當年慈禧避暑的所在——的路旁一個廣場上，有紅軍的一個紀念碑，碑用花崗石砌成，莊嚴而雄偉。犧牲者的名字，刻在紅星的下面。蘇聯紅軍的血，洒在中國的土地上，和中國廣大人民因反抗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而流的血結在一起。中國人民將永遠不忘記紅軍的英勇和道義的行動，感激他們，追念他們！我看見人們帶着一種感懷和讚嘆的神情在石碑旁徘徊觀看。我向你敬禮，偉大的蘇聯紅軍！你們不但使你們自己，使你們的祖國以及全世界保衛和平的人們覺得光榮！

整個承德市好像倒翻了的蜂窩。這是舊的侵略的，反動而奴役的統治已經推翻，新的革命而公正的人民的秩序正在建立。到處都是聲音，人們的臉上像過大年初一似的盈溢着一種說不出來的是什麼樣的興奮和新鮮。從奴役到自由，從專制到民主，整個城市就像一個被壓迫的人一樣，

翻過身來了，行動起來了。街上有那麼多的人，每天都像節日。一·二·三·四的四個區的人民正在進行復仇清算運動，他們的口號是：『有冤報冤，有仇報仇，』老百姓成羣結隊的打着旗幟，在街上走過；被清算的對象，漢奸，走狗，特務，警察，過去的偽村長，偽團長，配給店的老闆；他們以強抓勞工，逼死人命，尅扣配給；等等無數的罪惡，被圍在控訴者的中間，跟隨着走。有一天，我看見有一個穿着前清的靴袍，戴着拖玲的帽子，在控訴者中，搖搖擺擺的走。『這是個什麼？』我幾乎懷疑我的眼睛是糊塗了，會在這地方看見幾十年前從棺材裡拖出來的人物。『這就是那個漢奸，那個壞蛋村長，死在他手裡的人不知有多少哪！你看他還一點也不覺得悔恨的，大搖大擺的走，那該殺的；』旁邊一個擺花生攤的小販回答我。可惜我沒有時間去旁聽一次復仇公審大會。

十二月八日，由承德的大眾日報發起，召開了一次文化界座談會，這個會一連開了三日。會上到了從各方面來的人；有從重慶回來的熱河人，有從根據地回來的熱河人，以及原來就在承德居住的熱河人，總之，都是熱河人，熱河的文化界人士。只有極少數的，像我這樣的客人。本地的教育界和一些愛好文藝的人士，談着在敵人統治時他們所受到的種種迫害，有一位老先生談着談着就流下淚來了，他又帶着懺悔似的口吻說他過去是不認識共產黨，不認識八路軍的，日本鬼子罵共產黨共產共妻，國民黨也罵共產黨共產共妻，老百姓就弄得完全糊塗了，這回看見了共產

黨八路军，完全不是日本人和國民黨所說的，隊伍的紀律好，對老百姓很和氣；並且也看到八路军裡有很多的人才。在第二天的會上，共產黨熱河省政委胡錫奎先生作了一個政治報告，聽眾都表示滿意。坐在我旁邊的一個青年對我說：「過去那裡有過這樣的會，在會上大家想講什麼就講什麼，過去只要有兩、三個人在一起說一、兩句話，日本人看見了就要查問，就要檢舉思想犯了。誰還敢公開談政治！」

有人在會上提出希望經常有這樣的座談會，能够提高一些對政治上的認識，也有人提出了更具體的要求：組織一個時事座談會。

在這個會上，使我痛心地感到，這些在敵人統治下長大的青年，他們和根據地裡的青年，是怎樣的不同的，他們是拘謹而不太活潑，時時作着深深的鞠躬，當你和他們談話時，當你還沒有說完，他就連聲賠笑，低着頭，「是，是」的應着。青年應當是蓬蓬勃勃的，充滿着對一切知識的好奇心，活潑而且頑皮。但敵人把我們純潔而可愛的青年，壓制得快像木偶一樣。可是，我有信心，現在他們已經得到了解放，自由和民主的教育，社會生活，將使他們很快變得和根據地的青年一樣，活潑而有所作為，參加一切建設工作，挺起胸來，成爲新熱河的主人。

在承德停留了十來天，我又匆匆地踏上了旅途。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

宮原和本溪所見

一踏到東北內地，無論耳所聞目所睹，都留有敵人侵略的痕迹，一切東西對我都是觸目驚心的。

整個宮原佈滿了大大小小的日本式的西式房子，每座房子前還有一塊小小的空地或是院子，據說過去，這地方是日本人的住宅區，住在這裡的都是統治本溪市的行政·經濟各種事業的日本高·中級官吏及職員。

東北日報社住的是一座日本式西式房子，一層樓，過去該是一個宿舍，一小間一小間的房間裡，有兩隻日本式的舖位，那舖位倒像輪船上的掛起的艙位。每間房間都有熱水汀設備。在那掛衣服的鈎子下面，還留有日本人的名字，什麼三本·笠原……。從我房間的窗口，每天早晨，看見那邊通山溝的幽僻路上，走出一些穿着中國農民所穿的黑色短棉衣褲的日本人，日本人都已改了裝，穿起中國農民所穿的衣服——有些日本女人還有穿着她們的和服，雖然這樣，從他們走路姿態，他們的語言，也還掩飾不了他們是日本人。此外，他們臂上有一個附號。

一天，一位在延安認識的同志——他是東北人，領我逛街去，我們從宮原步行到本溪，（這段路程約有十來里，如果專僱一輛馬車，約費二十元，普通乘客每座五元，馬車很多，交通方便，）經過宮原車站，望見彩綢的牌樓上，有這樣幾個大字：『歡迎中華民國！』這個標語有些不通，歡迎中華民國！我說：『怎麼不通呢？那是以推翻偽滿洲國的那種身份來說的，不是歡迎中華民國麼？』同伴校正我。我點頭稱對。我想大約在我的腦子裡從未有偽滿洲國的存在，才有那種的看法。在寬敞的馬路上，我們慢慢的走着，先要走過一條『共榮橋』，經過『滿映館』，最後走過太子河上的大橋——橋頭有哨兵檢查軍裝同志的通行證，老百姓是自由往來的，本溪的軍風紀也很嚴——眼前就閃出了煤鐵公司的高大的烟囪，這便進入了本溪市了。

街上擁擠着來來往往的人，商店、小攤，接連不斷，顯得很熱鬧，每走幾步路就可以碰到一個日本女人，胸前掛着一個小木盤，兩手捧着，問你要不要『母基』——一種用粳米粉做成的餅。也有日本男人擺着個香烟攤。這些從前踏在別人頭上的人，他們的一句話，一個表情可以關係到被奴役的人的生命，他們的殘暴，他們的傲慢，他們的卑劣的行爲，是人類有史以來所少有的。今天，他們從別人頭上跌下來了，他們垮了。我不知道他們的心裡怎樣想想。我想，這對於他們是一種教育。

本溪是我國有名的煤礦區之一，煤礦外，還有鐵、硫磺、石灰、焦炭等礦產。在敵人統治的

時候，本溪有五個煤礦：柳塘、采家屯、茨溝（總公司所在地）田師付和牛心台。（宮原有一個鐵礦）煤礦工人佔了本溪市居民的一半（全市居民約有十五萬）。本溪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的軍需工業供獻了那麼多，不用說，他們重視這地方到怎樣的程度。據說在解放以前，曾有一本的一個海軍中將駐在宮原，他是負責監督本溪出產的特種鋼，是製造日本海軍軍艦所需要的。他常常教育他們日本人說：『寧死毋忘本溪。』

據一位對本溪煤礦作過調查並親自下過煤礦的記者告訴我，在敵人統治時，本溪煤礦工人的生活比牛馬還不如，他們『配給』到的是每人每天六兩『協和粉』（高粱粉一類），沒有衣服，能夠披到一隻破麻袋已經是不錯的了。更悲慘的是茨溝的煤礦，敵人把從華北華南戰場上俘來的捕來的八路軍和共產黨員，以及東北的反滿抗日份子，敵人所認爲的『政治犯』『思想犯』都送到這個煤礦裡做工，這些工人，敵人叫做『輔導工人』。別的煤礦設置一層電網，這一個煤礦則用兩層電網圍起來，還有『礦衛隊』放哨。煤礦工人被打死、餓死、凍死的，不知有多少，工人死了也不用棺材，把他們拖到南天門（本溪附近的一個山）上一丟就完了。過去，南天門上可以看到一堆堆的白骨，但是日本人那裡管中國人的死活呢，他們說：『三條腿的金蟬找不到，兩條腿的人還不好找……？』

敵人的統治是最反動的法西斯統治，最殘酷的殖民地統治。對於經濟，他是嚴格的經濟統

治，禁止自由貿易，即使你想賣一點兒花生米或葵瓜子那樣的小東西罷，也不行，這種小買賣也有一個「小賣聯盟」，要是有人敢於偷賣，至少也要被罰勞工兩年。日本人享有有限的東西（十分之三）配給「中國商店，而以十分之七的商品配給「日本商店。往往有許多商品，中國人只聽到過名字，就從來沒有看見過。比如拏一件小東西來說罷，從張家口直到本溪，找遍了西藥房，沒有能夠買到一點擦皮膚的甘油，店家異口同聲的回答我：「這是日本人禁賣的，找不到這東西。」什麼都用來服務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了。

民主政府建立以後，立刻取消了敵人的配給制度，人民得到自由貿易，現在本溪市有商店六百餘家（在八一五解放以前，本溪市有商店四百五十家，中國人的商店只有二百家），小販小攤，沒有統計。

民主政府曾組織了一個臨時國產保管委員會，接收了各工廠煤礦，現在工廠大多數已復工，遭受損失的工廠也在籌備復工中，民主政府又把敵人倉庫裡的棉衣拏來發給工人（每人一件）。工人的生活是火火的改善了，從前，每天只一元八角工資，還要扣去五角「飯伙」，做十五點鐘的工，沒有休息日；現在，工資增加到每日十二元到十九元，另外每月發給粟米五十斤，工人家屬未滿十二歲的，每月津貼十元，直屬親屬不能參加生產的每月津貼廿元，能生產的十元。工作時間三八制，星期日休息。也會大量的發救濟糧給貧民和貧窮的工人，每人十公斤，以應他們的急

需。

本溪有不少外鄉來的人，從山東和江蘇北部被敵人欺騙或強抓來做勞工，有幾次坐馬車和趕車以及同車的人談起來，他們中好幾個告訴我都是被騙來的。有一個徐州人告訴我，日本人騙他們說濟南怎樣好，誰知他從徐州上火車以後，就再也不讓他下車，一直送到東北來了。在本溪解放以後，這些被欺騙和強迫來的勞工，有的已經改就了原來的職業，今天，他們能自由地過日子，不一定需要回家鄉了。

有一次，我往本溪進一家鞋子店買一雙布鞋，店夥不很懂我的話，以為我是日本人，對我很冷淡。我們的商人不願出售東西給日本人，這是很可理解的。幸而那位陪伴我去的東北同志替我作了一個說明，於是他便和我談起一種在我聽去是異樣的話來了：「噫，這雙鞋子，小小的合適？布的沒有，呢的有。你的明白，我的不明白：」我告訴他，請他不用說這樣的話，雖然他不甚懂得我的南方話，但我完全聽得懂他們的本地話；我願意聽純粹的中國話，純粹的東北話。那個店夥笑起來了。後來，我有更多的機會聽到這類的話，據說，這是敵人所稱為「協和語」的，不但要中國人說，而且還要中國人寫，敵人要把我們的語言，文字也弄成殘廢。

單單從宮原和本溪，留給我的印象，使我覺得，十四年的烙印，是多麼的慘痛和深刻呵！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

在一個鐵路員工的家裡

正是最冷的日子，冰天雪地，一到露天，鼻孔邊和睫毛上都結了冰。

爲了等待修理汽車，在營盤停留了四天。我借住在一家姓趙的鐵路員工的家裡，那是兩間（其實只能算一間）典型的東北貧苦人家的房子，草頂，矮矮的。外邊的一間，推進門去，由於柴火的烟和熱氣的蒸發，使得你的兩眼模糊看不清。裡面一間有兩個炕，炕的一端擺着一些櫃子，兩個炕佔了房間三分之二的地位，剩下的空地恰好足夠安置一隻小小的菊花爐。除了趙先生到鐵路上工以外，一家七口人，吃飯·睡覺，整天整夜的時刻都是在炕上過的。炕是熱的，每個炕通到外間用以燒水煮飯的爐灶。起初，我在他們的房間裡很不習慣，好像沒有一角可以安心坐下的地方——也沒有一隻椅子，特別是不慣於盤膝坐炕，一上炕，我就只好躺着，兼之炕是暖的，一躺下，就想瞌睡。我覺得東北老百姓的住屋不很衛生，一家老小都在一個炕上，有疾病一定是容易傳染，但後來，當我住過了一間南方式的房間，沒有熱炕，也沒有爐子，生一盆炭火，冷飈我生起病來，才想到這些草，屋這些熱炕，對於一般老百姓，確實是既經濟又最合適的了。入鄉

隨鄉」，這真是一句現實不過的真理，你要是太主觀，你就只有碰壁。

趙先生夫婦都是三十七歲，長女已十五歲，次子十一歲，幼子約十多個月。他們夫婦都應當說是還年輕的中年人，但看起來，却像一個小老頭子，小老婆婆一樣，蒼老而瘦削的面孔，灰白的臉色；甚至他們的心情，也像被酷冷的嚴冬所凍壞了的小草，剛剛經過陽春的風一吹，透出一點嬌嫩的芽頭。每當趙先生從鐵路上工作回來，躺在炕上，拏起一本『劍俠傳』或『濟公活佛』，便孜孜地讀起來；夜裡，在電燈光下，一直要讀到午夜，興緻好的時候，還要朗讀給他的兒女聽。莫問世事這一定是十四年來，在敵人統治下，他習慣了的精神消遣；讀神怪小說。無疑的，敵人長期的統治，在他們的精神上留有束縛的傷痕，這種束縛的瘡傷，只有在他們能夠得到新的精神上的糧食和滋養，才使他們有力量正視自己的瘡傷，并自己來清算敵人所留給他們的毒害。他們需要正當的文化娛樂，以及使他們能够懂得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心，并學習為大眾，為自己而工作，關心別人一如關心自己，才是人類高貴而正常的生活。他們需要看一些說理的書和描寫生活的書，趕快供給他們一些這樣的書罷，我想民主政府一定會注意到這件事情的。

趙先生告訴我，他在鐵路上任職已經十七年，最初在南滿線，調到西滿，又調到瀋海線，十七年來，他沒有被提升過，因為，九一八事變的時候，他已經二十四歲，在敵人看來，他當然是受過中華民國教育的，而敵人是不歡喜受過中華民國教育的青年，還有，他不會講日語，這在日

本人看來，也是一個不可饒恕的缺點。這幾年來，他掙的是一直是一百元的月薪，配給的是高粱米。一家大小吃不飽，穿不暖，湊合着打發日子。在偽滿時，鐵路上做着同樣工作，却有幾種不同待遇：日本人，當然，那不用說了，他們是大老爺，漢奸特務，是敵人的爪牙，寵愛的走狗，苦的是爲了吃飯，不得不在敵人漢奸之下做着工的員工們，在日本人看來是不可靠的，「良心大壞的」，是我們有民族良心的廣大的鐵路員工。

「如果再不光復，那麼，我又要被調開瀋海線了，日本人不願意把我們放在一個地方工作，時常要調來調去，每調一次地方，我們就變得更窮一點。最初我在南滿線上工作，離家很近，還有自己的二、三間草屋，够自己住家。後來愈調愈遠，以此只好租房子住，沒有半間房子，也沒有半寸土地，單靠這點薪水過活，像我這樣的工員很多，日本人總要把我們弄得一乾二淨，使我們不能不依靠他們，服從他們。趙先生帶着忿恨，接着說：「現在我們是像個人了，要是從前，不瞞你陳先生，我們衣沒衣，鞋沒鞋，真見不得人呢！我這件大衣是八路軍來了以後，公家發給我的。孩子們的棉衣都是光復後做的。」民主政府建立以後，交通馬上就恢復了，趙先生被提升爲這一段鐵路的段長，他的薪水增加到一倍以上，（以前偽滿時的那個漢奸段長早已逃走了。）他們的生活有了顯著的改善。吃得飽也穿得暖。

「日本人在我們東北，不論土地，人力和物力，統統都收括盡了，「出荷」「抓勞工」「勤勞

奉仕，一：：那一樣沒想到呢！如果再不光復，今年他們連我們的頭髮也來要了。每個老百姓要「獻納三寸長的頭髮。」趙先生說着，又轉談到小孩子身上。「小孩子們也可憐呵，問問他們看，能唸上點什麼書呢？」

十一歲的男孩插下嘴說：「我們每個小學生每年要繳幾斤豬血，去年，還要每個人繳三張野兔皮。有一天，老師領我們上山去捉兔子，找了好久，才找到一隻兔子，咱們大家趕去，趕了好半天也沒有趕得上，還有八·九歲的小學生，跑到山上就已經跑累了，那裡還有力氣趕兔子呢，也只好拼着命的趕：：」

女學生也一樣要「勒勞奉仕」，一樣也要繳納豬血，去鋤草，上山採藥：：「一學期唸不上幾天書。男女學生必修的功課是日文。趙先生的長女曾經唸過偽滿的「國民高等」（等於我們舊制高小的程度），她拿出一本日語讀本給我，并說：「如果日語不用心唸，就不能升級，往往因為考不好日語，被打耳刮子，罰跪：：但我們的老師有時也對我們悄悄地說：「孩子們，用心唸滿語（我們的國語，敵人稱爲「滿語」），滿語將來總有用處。我爸也常說：我們是中國人，多認幾個中國字，現在沒有好書唸，將來總有一天能唸到自己的書。」

「你們知道關裡的抗戰麼？」

「怎麼不知道呢？從那個時候起，我們在鐵路上工作，被監督得更嚴，不許中國人之間講中

國話，不許交頭接耳，只要有一點使他們不順眼，他們就叫我們跪着，叫我們之間互相的打耳刮子。趙先生一邊說，一邊比給我看：「兩個人對跪着相互的打，不打得凶還不行，得狠狠的打，劈劈拍拍，這樣，日本人在旁邊看着哈哈大笑，不然，他們就罵：『八格阿魯，重重的打』，此外還時常叫我們集合起來祈禱「聖戰」勝利，還有一星期三次的防空演習：」

趙太太搶着說：「到防空演習那一天，男女老幼都要提着水桶的，或拿着鐵頭的，到指定的場上去排成隊，日本仔來檢閱，缺了誰，誰立得不像樣，有被用腳踢的，有被用皮鞭抽的；等說是飛機來炸了，消防的，救護的，就都要做得若有其事。他們日本仔可害怕飛機來轟炸，咱們不怕，咱們想，飛機來多炸死幾個日本仔，讓咱們看看他們也有難受的一天。」趙先生打斷他的夫人說：

「最近一年來，日本人的威風也沒有從前那麼大了，我們也看出日本人是漸漸的不行了，八月九日蘇聯對他們宣戰以後，鐵路上的日本人驚惶得很，我們偷偷的從十一日的報上看見長春被炸。大約隔了四、五天，有一天，日本鬼子召集日本人唸詔書，不許中國人看。鬼子他們從來都是有什麼事不許中國人聽，也不許中國人看的。但是有一個懂得日本話的中國人偷偷的去看，看見唸詔書的日本軍官唸一下，就哭起來了，嗚咽得唸不下去，換一個軍官上去唸。就知道總是日本投降了。後來，看見許多火車載着日本男女往東北方去了。但是老百姓還不敢什麼的，等到八

路軍進到這裡，老百姓這一下可高興了。」

這時候進來一個約莫有五十多歲的老漢，趙先生介紹我說這是他們的隣居，也是個鐵路老員工。老漢也來參加叙說他對於東北光復的興奮和快樂：「咱們總算盼到了好日子！多麼好的軍隊，從沒有見過這樣好的隊伍，不打人，不罵人，一點也不驚擾老百姓，他們說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教出來的隊伍都是這樣好的。這地方很多年輕人都跟上他們去了，我的兒子也吵得不行，一定要去，也去了。大家都看這個部隊太好了，年青人都要跟得去。」

在我動身的上一天晚上，趙太太叮囑她的大女兒明晨早點起來生爐子，燒點開水，好讓我喝了水，洗了臉再走路。女孩子爲着這件事情，半夜裡驚醒過來，開亮電燈，立在掛鐘面前，自言自語的說：「二點鐘！」到了早上，她睡得很甜蜜，等她張開眼來看見爐子已經生起，抱怨她母親爲什麼沒有叫她。

他們是清苦的，但他們的熱情和好意使我感動。當我動身的時候，趙先生夫婦送我到門口，帶着抱歉的口吻說：「我們沒有很好招待你，實在窮得見笑。再過營盤，一定來我們這邊玩玩！」

「你們招待得我好极了！我相信再見你們的時候，你們生活得一定比從前好，現在你們已比從前好了，將來還要好。」

他們笑了。他們的女孩和男孩一直送我到汽車邊。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

人民的審判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從八、九點鐘起，在靠街的玻璃窗口，就看得見男男女女往道北走去。當我走到那個廣大的場子上時，整個場子裡已經挨挨擠擠的站滿了人，連場子角落裡的石磨上也都立滿了人，有男女學生，有武裝隊伍，更多的是老的，小的，男的，女的老百姓，該有六，七千罷。他們的視線都朝一個方向望着，朝那掛有「復仇清算大會」橫聯的台上望着。

今天，海龍人民控訴、審判一個日本的走狗，漢奸，特務，過去會是偽「協和會」的「委員」，糧市區的區長，萬字會的「院監」，除了這許多「顯赫」的頭銜以外，他還有一個更「顯赫」的綽號，由於他依靠敵人起家：無數的市房，數千担的穀子，加上敵人扶植的勢力，「海龍王」——王文超，在這一帶是無人不曉的。

會場的空氣是緊張而嚴肅。天空開始飄下一大朵一大朵的雪，但人們的心被一件不平常的事所激動，所興奮，完全沒有理會那落下來密集的雪花。本來，在東北，在海龍，這個時季下雪，也實在是一件太平常的事。

主席宣佈開會以後，便有兩個帶鎗的人擁着一個人上台來，廣場上的人羣起了一下擾動。『幹什麼給他上台去，那小子，把他摔下來，還給他坐椅子！』有人咕嚕着，可是，主席一定沒有聽到。

『誰？那漢奸在那裡？』我拉着旁邊一位鬚髮皆白的老頭子問。

『就是那個鴉片烟鬼，面孔又瘦又蒼白的。』老人用手向台的左角指了一下。

在台的左角，一個高個子瘦長的男人，穿着一套黑布棉衣褲，戴着一頂皮帽，依靠着一隻長凳子，面孔斜向着台幕，好像恨不得縮到台幕裡，隱藏起來的。但是從我立的地方，還能够看得見那隻走狗，漢奸，特務的面孔，方方的；對敵人如此諂媚，服從，對同胞如此冷酷，無情的面孔。

海龍縣縣長首先報告接受這件案子的經過：『民主政府收到老百姓對王文超的控訴狀有這麼厚一疊（他用手撐開，比了一比），我們才把他扣押起來，現在，鄉親們，你們控訴罷，把你們多少年來受這個走狗，漢奸，特務的苦都傾出來罷，不要再害怕他了，民主政府會給你們作主！（大意是這樣）』

掌聲，口號聲和控訴者的喊聲混成一片。當縣長的話還沒有說完，台前已經擠攏了要上台去控訴的人。

控訴開始了。

一個七十五歲的老婆婆，牙齒都已落光，她向王文超要兒子，兒子是被王強抓勞工抓去，至今一去不返：

一個老漢控訴被王強佔土地；另一個控訴被王強買了房屋。

小學教員楊云龍，王文超的大配給店東興成掌櫃的兒子，他父親不忍心尅扣老百姓的配給被王文超趕出來，替王做了一輩子掌櫃，沒有得到一點報酬。照東北照當地的規矩，在商店裡做掌櫃是可以分到一定的紅利的。楊掌櫃一回家就因氣得病死了。「孩子！將來光復的時候，要給我復仇呵！」楊云龍說到這裡，哭泣代替了話聲。

台下人叢中，有人悄悄的用手巾擦着眼角，有人揪着鼻涕，大家想起過去的悲慘年月，好像幾千斤石頭壓在肩上挺不起身來的年月，受敵人漢奸踐踏的年月，不由的眼淚滾下來了。

「太壞了，這賴小子！」在我旁邊的老人，一邊擦着眼睛，嘴唇顫抖着說。

「看起來他還年輕呢，誰想到他已經做了這麼多惡事！」我說。

「哼！你別看他年輕，這小子做惡事的辦法可多呢！」旁邊一個中年婦人對我說。

「他今年二十七歲，已經做了十年的走狗、漢奸！」一個商人模樣的男子說。

確實，這壞蛋所做的罪惡，如果一件一件的記錄下來，起碼可以成爲一本有二、三十頁的小

冊子。

十三歲時，王文超和一個姓張的女子結了婚，可是不久，他爲了「高攀」，與張離婚，重與偽縣長王永恩的女兒結婚。

在一九三五年，他就認識了治安隊的日籍教官伊東，以後，他和海龍縣的日本特務股長也好，警務主任也好，經濟股長也好，沒有一個不是取得密切聯系的。日本特務要他在萬字會裡探聽有沒有「家裡」的活動，懷疑「家裡」和抗日聯軍的楊靖宇有關係。又對他說：「你作買賣，多造幾個大資本家，這好統制經濟。」於是，王文超就在敵人的扶植下成爲大資本家了。這是用敵人的統治，同胞的生命、血和肉造成的大資本家。

控訴繼續着。

八一五日本投降以後，王文超的恩人，特務股長兼經濟股長日人廣田，把手鎗送給王文超，可是王把手鎗回給廣田：「給你自衛罷，」王說。他又贈給廣田二百元，兩套衣服，把廣田夫婦化裝了，用汽車送出海龍。分別的時候，還和廣田抱頭大哭。當時，王是維持會的委員。

「忘本的傢伙，對日本人這樣好！把手鎗送回給他，來打死我們中國人麼？」人叢中投出咒罵的聲音。

「什麼維持會？」我好奇地探問。

「就是那些國民黨鬧的！」一個老婆婆帶着忿慨的口吻回答我。「八月十五日那天中午，從無線電中聽到說二小時以後，國民黨來接收海龍，到了下午二點鐘，老百姓到街上一看，那些從前的漢奸，特務，警察，都掛上了國民黨員的袖章，大搖大擺的走在路上，他們都變成國民黨員了！我們都關起門來躲到家裡。你是關裡來的罷，你不知道這些。王文超，就在那個時候做維持會的委員。」

商人模樣的人對我作補充：「有的漢奸聽說化二十萬偽幣買一張國民黨證，也有還要買個老資格，更多化上幾萬，寫上一九四三年，四四年入黨。」

「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喊聲穿過那寒冷的天空，像一股熱流的沖激着。

「我看見過魯佛爾博物院中世界有名的彫刻『最後的審判』，今天，我看見了真實的最後的審判，人民的審判。」

真理和正義出現了，復仇之神在微笑。

「海龍王」打躬作揖，向大家認罪。

最後，判決他的財產一部份沒收歸公，一部份退回給他從前所強佔別人的，一部份留給他養家。三年徒刑，五年遞奪公權。財產由清算委員會來處理。

「多麼好的政府，還留一部份財產給他養家呢！想得多周到。」

『將來壞人都要變好，好人要更好。』
人們在談論着。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

「這回我可樂了」

海龍縣第一屆臨參會的主席團裡，坐着一個中等個子的男子，黝黑而略帶長方形的面孔，發光的眼睛，顯得神采奕奕；黑棉布大衣的腰間，束着一條黃色帶子，愈加顯出機警、敏捷的樣子。他的發言簡潔而扼要，末了，他責問國民黨內的反動派親日份子道：「反動派親日份子對我們一筆抹殺，難道楊靖宇，趙尚志，周保中，無數前仆後繼的抗日聯軍都不抗日麼？」

坐在我旁邊的一位記者告訴我，這是梅河區居民所選舉出來的參議員，他叫齊福生。

會後，找着齊參議員：「聽說你會參加過抗日聯軍，你能把過去的日子和我談談麼？」他毫無難色的答應了我，並且就在那個晚上，和我滔滔不斷地談起來了：

「我是梅河口人，原籍遼陽，今年卅二歲。在十二歲時，我家搬到珠河縣，在那裡種地開荒。珠河縣後來成爲抗日聯軍第三軍的駐地，是游擊戰爭的根據地。一九三二年在這裡，我參加了反日會（青年大同盟），做了一年半的地方工作，組織該地青年大同盟。接着，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我們人很多，這是因爲老百姓誰也不願做順奴，聽到說是幹抗日的事，大家都不管死活

的前來參加。這年秋天，敵人進行大「討伐」，珠河靠山林，敵人實行燒殺政策，老百姓被日本仔斃的很多，地方工作受到極大挫折，我也很難存身，就在這時，被派到方正縣去；在那裡我參加了隊伍，抗日聯軍第三軍第六師第三團，擔任青年幹事。一九三四年轉入了黨。一九三五年我們三百多人出發到湯原縣，路上遭遇到山林警察，我們先呼口號，進行攻打第一部；等到第一部被擊潰以後，我們穿上第一部的衣服，攻打第二部。結果，被我們打死了二、三十日本人——這個山林警察隊裡的全部日本人，解決了四、五百個山林警察，其中有許多情願留在我們部隊裡，不願留的，我們將他們放走了。

接着，我們進到木蘭縣的二道營子，又繳了二百多偽警，在行軍，在戰鬥中，我們有犧牲，但隊伍還是擴大了，敵人探聽得是趙司令（趙尚志）親自領導的隊伍，追得我們很緊，當我們到巴彥縣時，敵人整日整夜尾隨着我們，上面是飛機，底下是日本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好分散。我被分配到抗日義勇軍裡去做工作，同去的有廿多個人，由一個姓韓的團長帶領着。我們和當地的義勇軍聯合起來，一九三六年，在泡海川，我們解決了日本的一部份海軍，約一百多人，獲得了兩尊迫擊砲，兩架機鎗，五、六十支大鎗。我們在江邊窺探着他們，等得他們下江來，我們就打。後來，子彈越打越少，我們只好隱避到山裡，日本人進山來的時候，我們消滅他。

一九三九年，我們被迫轉到木蘭北面的林子裡，那時的情況惡劣極了，日本的「討伐隊」四

出搜尋我們，我們整天攢林子，沒有東西吃，儘吃馬肉和生包米，就這樣也還不能活動，只好又分。我散工作參加的是一個馬隊，十月裡，到達彬州南捉木崗，我們約一百五十人，分住三個大院子。敵人老是追趕我們，當時我們心裡想：「和敵人拚了罷，死活在一遭。」就在這一夜，敵人把我們包圍了；大早天一亮，看見滿山儘是日本仔，就打起來了。我們的院子在山脚下，等待日本仔走下來，走得很近的時候才打，打死他們四、五百。最後，這一支奮戰的孤軍，都犧牲完了。敵人的一顆炸彈把我的刺刀炸壞了，炸彈皮傷了我的腿部，我乘一陣混亂的時候，爬到山邊的冰溝裡，在碎冰下面躲藏起來。天黑時，日本人走了。房子已經被炸光。夜裡，附近很多老百姓來揀馬肉，聽到老鄉們揀完了馬肉，絡繹不絕的走了，還剩下一個老頭子，走得慢。我便叫起爺來，儘叫着，儘叫着，老頭子倒并不是沒有熱情，他實在是不敢措我回去，他害怕特務，特務可有的是呵！當時，我身邊還有八百圓，我求他措回去，好好商量。終究，他把我措了回去，但是，不敢放在他家中，他把我安置在蘿蔔窖裡，也不敢上藥。在這個蘿蔔窖裡我過了一個冬天，從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直到正月裡，我的傷才好了，能够行走，我便動身回到哈爾濱去。

在那裡，沒有打聽到我們自己的人，只好回到珠河，身邊只剩了二十來圓，於是又到彬州，找我的家。自從我走之後，我的家不能再在珠河存身，早已移在彬州；在彬州，還是打聽不到我們的同志，彬州的日本特務和漢奸，狗腿子頂多，我又只好走，跑回老家梅河口，種地混日子。

我爲着找不到自己的黨和自己的同志老憂愁着，我想，打日本也許還要打他個五、六年，老找不到他們怎麼辦呢？在工作上我得不到指示和領導，真是着急呵！我自己想，無論怎樣，我總還要有個表示，每年我就要貼好幾回標語，從梅河口，海龍，直到磐石，都給我貼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推翻滿洲國！」，「成立民主政府」；黑夜裡貼上，第二天早上就給日本的特務撕掉了，媽的……

去年八月底，聽說八路軍已到了山城鎮，我找得去，果然有「八路」附號的部隊，我向一個連長找我的關係，告訴他我會當過抗日聯軍，打過日本仔。連長說：「你說這個，拉你的脖子！」他邊說邊下炕來，不由分說，伸出拳頭揮過來，我一邊往後退，一邊對他作揖，并說：「何必這樣呢？我是一個老百姓東北恢復了，人人都有份，就算我沒有功，到底也沒有罪。他把我連打帶跌的趕了出來。我心裡想，找不到真正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決定還是當老百姓。」

這時候，我插下一句，問道：「你怎麼知道這不是真正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呢？」

「唉！同志，這還用說麼？我在抗日聯軍裡好多年，我們的領導人都是共產黨員，像楊司令，趙司令，他們對待我們弟兄都像自己的親兄弟，他們對老百姓都像一家人，在部隊裡經常進行教育，不能罵老百姓，也不能打老百姓，同志間對任何人都要講道理；抗日是最堅決，那裡有這樣的連長，而且聽到我說打過日本仔，就要拉我的脖子？」他頓了一下，又接着說下去：「我

這樣想定了，就又跑回家來；可是一回來，給梅河口的漢奸隊——公安隊打了一頓，說我是八路軍的探子，把我的眼睛也差一點打壞了，你看，現在還沒有好全呢！」他指着左眼睛給我看，眼角上的確留着蠶豆火一個還新鮮的傷疤。

『九月裡，從來往於西安一帶的商人口中，聽說西安已經到了真正的八路軍，我便往西安去，當進到一座屋子裡，看見站崗，他聽說我是找八路軍來的，就把我綁起來了，我說：「我又沒有當過漢奸，特務，何苦這麼對付我？」越這麼說就越把我打得凶。我說一句，他們把石灰往我口中塞一把。又把我兩腳倒掛起來，用鎗托打我。我說：「要斃，就斃了我罷！這年頭我真是該死了，不要給我容罪受了！」過了一個晚上，又好說好話的求他們：「放了我罷，我實在是個老百姓。」他們叫我替他們做活，做了幾天，我悄悄的跑走了。

過了幾天，八路軍真的來了，梅河口的那些掛着「八路」附號的漢奸隊，起初還不相信，後來一看見過來的部隊的軍衣都是長的，長到差不多近膝，（偽軍，漢奸隊的軍服還是敵人時的短軍服），他們就說：「是真的」，一邊放鎗，一邊逃跑，從早晨到十點鐘，就完全解決了。老百姓都說：「真八路了！毛澤東和朱德的部隊來了，好部隊來了！」我跑到那裡一看，真的不同了，隊伍駐札的門口擠滿了去慰勞的老百姓，我還見到過去楊靖宇部隊中的同志，他們把我送到政治部，尤生同志和張主任把我招待着。

終究給我找着了，這回我可樂了！

他笑了。

最後，這位抗日老戰士，今天是海龍人民的代言人，帶着忿慨的說：「國民黨內的反動派親日份子總說我們東北人不抗日，活該做亡國奴，沒志氣，我要問：不抗日的是誰？不正是他們把我們出賣了的麼？我們東北人爲了保衛自己的土地和自由，十四年來不知犧牲了多少生命，流了多少血，他們何曾接濟我們一鎗一彈，更不要去說開部隊來幫助我們抗日了，誰曾見過他們派來一兵一卒麼？今天，東北已經解放了，他們倒要來奪取現成的果實，難道東北人民十四年來抗日的血是白流的麼？我們東北人民是有權利說話的，我們也決不容忍反動派親日份子來東北實施專制獨裁。」

這一夕話彷彿使我讀了一篇東北抗日聯軍戰鬥的簡史，並且從這位堅強而樸素的農民身上，使我了解和尊敬東北廣大的人民是有着極好的品質。今天他們的忿慨引起我的同情，而他們的要

求，和平，民主，團結，建設，在我覺得完全是正確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